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八十六本，第一分

出版日期：民國一〇四年三月

## 再造強權——準噶爾琿台吉 策妄阿喇布坦崛起史新探

張建\*

十七世紀最後十年，內陸亞洲局勢風雲變幻。噶爾丹將準噶爾汗國締造為中亞霸主後，率眾東進，試圖重現「大蒙古國」之榮光，兵敗身死。康熙帝借機將喀爾喀與庫庫諾爾和碩特納入大清版圖，成為游牧部落之共主。惟有準噶爾在策妄阿喇布坦治下，維持一方諸侯之局，積蓄力量，謀求東山再起。

策妄阿喇布坦是十七世紀末到十八世紀初準噶爾汗國的領袖。他幼年失怙，常年流浪，熱衷聲色，因狩獵而眇一目，因漁色而梅毒纏身，但又是傑出的政治家。一六八九年，他為免遭噶爾丹的毒手，逃往博羅塔拉，聯合阿努喀屯反對噶爾丹，曾在吐魯番生活數年。他曾襲擊科布多，噶爾丹失去大本營，被迫北走克穆齊克河。噶爾丹死後，他積極招攬內亞部落民，強制森林部落西遷沙喇伯勒，復將布魯特人遷往伊里，彼此牽制。經他苦心經營，準噶爾汗國從廢墟中再興，重新成為地區強權，聲威遠播中亞，與清朝抗衡近四十年之久。他的崛起不僅改變了準噶爾的命運，對中國史乃至亞洲史的走向也影響深遠。

關鍵詞：策妄阿喇布坦 內陸亞洲 清朝 準噶爾

---

\*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 引言

十七世紀，大明邊外的女真 (jušen) 與衛拉特 (oyirad, 即瓦剌) 蒙古先後崛起，改變了亞洲大陸的權力格局。四衛拉特中，綽羅斯的準噶爾部 (jegünɣar) 日臻強盛。康熙十年 (1671)，準噶爾琿台吉僧格死於內訌，其弟噶爾丹收平叛亂，在康熙十六年統一四衛拉特，被拉薩封為「博碩克圖汗」。<sup>1</sup>

噶爾丹博碩克圖 (ɣaldan bošoɣtu) 以四衛拉特為基礎，歷經十餘年征伐，建立起東抵嘉峪關，北至葉尼塞河中游，西括七河 (謝米列契耶 Семиречье) 流域，南至帕米爾高原，囊括伊斯蘭教聖地喀什噶爾、葉爾羌的準噶爾汗國。在拉薩教廷支持下，噶爾丹在康熙二十七年併吞喀爾喀蒙古後，為重現大蒙古國的榮光，於康熙二十九年深入漠南，與大清國兵戎相見，但終歸失敗。<sup>2</sup>

揆諸噶爾丹失敗之因，除受制於清朝強大軍力外，其侄——僧格次子——策妄阿喇布坦 (zewang rabtan / ts'ewang rabtan / Цэван Равтан) 起兵自立，<sup>3</sup> 引發四衛拉特分裂，亦關係匪淺。策妄阿喇布坦的一生極富傳奇色彩：未及而立，為躲避乃叔的謀害，逃離汗庭，以準噶爾傳統游牧地博羅塔拉 (boro tala) 為中心建立政權，與之分庭抗禮，導致噶爾丹腹背受敵，重鑄蒙古帝國的宏圖付之流水。

<sup>1</sup> 「衛拉特」即「漠西蒙古」，源於十三世紀的「斡亦剌惕」，明人呼為「瓦剌」，清人呼為「厄魯特」(ūlet)。十四世紀後，衛拉特人自稱「都爾本衛拉特」(dürben oyirad)，即「四衛拉特」。十五世紀，瓦剌興起，統治蒙古高原，於正統十四年 (1449) 大破明軍，俘虜英宗，進逼北京。景泰五年 (1454) 後，瓦剌勢力西漸。十七世紀初，衛拉特再度興盛。當時的四衛拉特，由和碩特、準噶爾、土爾扈特、杜爾伯特組成。蔡美彪，《中國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9冊，頁328-335；白翠琴，《瓦剌史》(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頁1-187；和田清著，潘世憲譯，《明代蒙古史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頁215-290。

<sup>2</sup> 札奇斯欽，《蒙古與西藏歷史關係之研究》(臺北：正中書局，1978)，頁609-758；烏雲畢力格、成崇德、張永江，《蒙古民族通史》(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卷四，頁105-113；格魯塞 (René Grousset) 著，藍琪譯，項英傑校，《草原帝國》(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頁653-658。

<sup>3</sup> 康熙年間檔案裡，zewang rabtan 或 ciwang rabtan 的滿文寫作 ts'ewang rabtan 或 ts'ewang arabtan，漢名譯法不一，有「澤旺阿喇蒲坦」、「策旺喇卜灘」、「策妄阿喇布坦」、「策妄阿拉布坦」等。本文據馬齊等纂，《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傅恒等纂，《欽定平定準噶爾方略》(乾隆三十七年 [1772] 刻本，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等官書，以出現頻率最高的「策妄阿喇布坦」名之。

噶爾丹覆亡後，他接納了部分政治遺產，歷經十餘年生聚，摧垮宿敵哈薩克，擊敗沙俄與大清這兩個世界上最大的陸權帝國，一度佔據西藏，確立了準噶爾的強權地位。他的崛起不僅改變了內陸亞洲的格局，對這一地區的歷史走向亦影響深遠。

然而，蒙古史巨擘茲拉特金 (И. Я. Златкин) 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坦承，苦於史料匱乏，對策妄阿喇布坦頭二十年 (1678-1697) 的活動所知無幾。<sup>4</sup> 所以，該課題的研究成果堪稱寥落。俄羅斯學者最早意識到該課題的重要性。波茲德涅耶夫 (А. М. Позднеев) 於一八八七年給維謝洛夫斯基 (Н. И. Веселовский) 寫了一封探討準噶爾史的長信，用很長篇幅敘述策妄阿喇布坦的崛起史。<sup>5</sup> 他的看法基本為後世俄（蘇）學者所沿用，對蒙古史學界影響甚深。

不過，日本的若松寬教授在一九六四年發表〈策妄阿喇布坦的崛起〉一文，運用漢、俄、蒙文史料，對策妄阿喇布坦在一六七一至一七〇四年的活動作出了細緻考證，否定了波茲德涅耶夫的諸多觀點。四十年間，尚未有文章能與之並駕齊驅，成為後學難以望其項背的學術高峰。<sup>6</sup> 但他撰寫此文時，俄藏一六八五至一六九一年蒙古事務檔案和中國大陸藏清朝內閣蒙古堂檔案均未披露，導致對策妄阿喇布坦早年活動軌跡，與噶爾丹衝突的考證難稱盡善。他對波茲德涅耶夫部分舊說的否定，也顯得過於草率。

傅斯年所長有云：「史學便是史料學」，<sup>7</sup> 史學的進步，多有賴於史料的新發現。筆者能夠重新研討該課題，實得益於中國大陸、臺灣、俄羅斯（蘇聯）的檔案工作者數十年辛勤劬勞。本文使用的主要史料包括：

(一) 莫斯科二〇〇〇年出版的《俄蒙關係，1685-1691：檔案彙集》(Русско-мого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685-1691: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收錄衛拉特東

<sup>4</sup> 茲拉特金著，馬曼麗譯，《準噶爾汗國史 (1635-1758)》(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頁 307。

<sup>5</sup> Веселовский Н. И. Посольство к зюнгарскому Хунтайджи Цэван Рабгану капитана от артиллерии Ивана Унковского и путевой журнал его на 1722-1724. *Записки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Т. 10. В. 2.* С. Петербург, 1887, с. 239-264.

<sup>6</sup> 若松寬，〈ツェワン・アラブタンの登場〉，《史林》48.6 (1964)：50-80；漢譯本參見吳永明譯，〈策妄阿喇布坦的崛起〉，馬大正等編譯，《清代蒙古的歷史與宗教》(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4)，頁 77-110。

<sup>7</sup> 傅斯年，〈史學方法導論〉，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卷二，頁 309。

張建

進前後，噶爾丹、策妄阿喇布坦與俄國往來文書，可補滿、蒙、漢文史料之不足，拓寬研究者的視野。

- (二)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簡稱「一史館」）藏內閣蒙古堂檔案，囊括一六九〇至一六九七年清朝與策妄阿喇布坦往還的敕書、奏文，可據此校勘官書不實之處。
- (三) 宮中朱批奏摺與軍機處檔案，前者包括分藏臺北故宮、北京「一史館」的朱批奏摺。軍機處雖遲在雍正八年（1730）設立，但時值用兵西北，部分檔案涉及策妄阿喇布坦崛起史，價值頗豐。
- (四) 滿文本《親征平定朔漠方略》（*beye dailame wargi amargi babe necihyeme toktobuha bodogon i bithe*），雖然它作為「間接史料」曾遭到烏雲畢力格的批判，<sup>8</sup> 但清初檔案有所散佚，而該書系統記載清朝討伐噶爾丹史事，可拾遺補闕，且因康熙朝邊臣所進奏疏多為滿文，故該書較漢文本《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具有更高的史料價值。筆者希望立足於前人研究，整合檔案文獻，對策妄阿喇布坦崛起史研究中的薄弱環節進行考論。

## 一．「吐魯番說」可信嗎？

策妄阿喇布坦脫離噶爾丹的時間，存在波茲德涅耶夫的一六七八年和若松寬的一六八九年兩說。二者區別在於，波茲德涅耶夫認為策妄阿喇布坦為躲避噶爾丹的迫害，在一六七八年後棲居吐魯番，而若松寬堅稱他在喪父後追隨噶爾丹，直到一六八九年始亡命天山，不可能去吐魯番。「吐魯番說」成為策妄阿喇布坦崛起史上的一大謎團，必須釐清其本來面目，而欲正本清源，就先要耐心爬梳史料，窮究策妄阿喇布坦失怙後的活動軌跡。

---

<sup>8</sup> 烏雲畢力格指出《親征平定朔漠方略》收錄的滿文檔案多被篡改，須予以批判，而濮德培（P. C. Perdue）則認為該書代表檔案與《實錄》的中間階段，尚屬可信。其實，該書按傅斯年所長的劃分標準，屬於「間接史料」，固然要對照原檔更正彌補，但就記事的系統性而論，它仍是研究策妄阿喇布坦崛起史的重要材料。請參傅斯年，〈史學方法導論〉，頁310-311；烏雲畢力格，〈康熙皇帝第二次親征噶爾丹的滿文文書及其流傳——『方略』（*Bodogon-i Bithe*）類史書的史料學批判〉，氏著，《十七世紀蒙古史論考》（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頁88-157；Peter C. Perdue, “The Qing Empire in Eurasian Time and Space: Lessons from the Galdan Campaigns,” in *The Qing Formation in World-Historical Time*, ed. Lynn A. Struve (New Yor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57-91.

波茲德涅耶夫稱：

譯文：但在一六九〇年，我們眾所周知，策妄阿喇布坦已是準噶爾的強大王公，故而 he 逃離噶爾丹，只能在一六七八年。……我認為，看了策妄阿喇布坦自己說的話後，很難有不同觀點。因為他正是躲到了吐魯番 (Турфань)，而且因為吐魯番乃是離他最近之地，能讓策妄阿喇布坦感到更安全。……因為烏蘭布通戰役發生在一六九〇年，而 (那時) 策妄阿喇布坦已是準噶爾的王公，那麼他返回 (準噶爾) 的時間，是在一六八八年春到一六九〇年夏這一段。他離開吐魯番，或是一六八八年底，或是一六八九年初。<sup>9</sup>

波茲德涅耶夫的觀點被俄國 (蘇聯) 的中亞史學者奉為圭臬。巴托爾德 (Василий В. Бартольд) 的《七河史》(《謝米列契耶史綱》) 與茲拉特金的《準噶爾汗國史》均採此說。<sup>10</sup> 然而，他的觀點後來遭到若松寬的挑戰：

譯文：波茲德涅耶夫與贊同他的巴托爾德、茲拉特金等著名學者說，策妄 (即策妄阿喇布坦) 在索諾木 (即策妄阿喇布坦之弟索諾木阿喇布坦) 死後，在一六七八年去吐魯番，實謬。……索諾木被殺是一六八八年，策妄擊敗叔父是一六八九年。<sup>11</sup>

若松寬的史料依據，是《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咱雅班第達傳》和俄國武官翁科夫斯基 (Унковский) 一七二二至一七二四年 (康熙六十一年至雍正二年) 出使準噶爾的日記，均屬後出文獻，並非第一手的檔案史料。欲辨孰是孰非，必須根據檔案，勾稽策妄阿喇布坦早年的活動軌跡。

一六八九年，原居科布多河的吉爾吉斯人為逃避噶爾丹，遷往庫茲涅茨克 (Кузнецк)。當地官員派人調查情況，得到了噶爾丹與策妄阿喇布坦分裂的情報：

譯文：黑卡爾梅克人帶著妻兒遠離戰爭和饑荒，來到吉爾吉斯地區生活。之後，蒙古人同黑卡爾梅克人開戰。博碩克圖汗的親侄阿拉布坦帶著自己的軍人以及婦孺脫離了黑卡爾梅克人，向和碩特 (去)。博碩克圖汗隨後帶兵追擊，他們的關係破裂了。……阿拉布坦帶著自己的人眾，在伊里

<sup>9</sup> Веселовский Н. И. Посольство к зюнгарскому Хунтайджи Цэван Рабтану капитана от артиллерии Ивана Унковского и путевой журнал его на 1722-1724. с. 251-253.

<sup>10</sup> 巴托爾德著，趙儷生譯，《七河史》(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13)，頁 89；茲拉特金，《準噶爾汗國史 (1635-1758)》，頁 288。

<sup>11</sup> 若松寬，〈ツェワン・アラブタンの登場〉，頁 62。

河 / 額敏河 (Оле-реке) 一帶游牧，距庫茲涅茨克堡七日路程。<sup>12</sup>

本條史料，來自俄曆一九八年（康熙二十九年，1690）莫斯科給伊爾庫茨克地方長官斯克雷普列夫（С. М. Скрыплеву）的訓令，回溯了一九七年吉爾吉斯人提供的叔侄反目之概況，是已公佈俄國檔案中，關於此事的最早紀錄。策妄阿喇布坦被略寫作「阿拉布坦」（Араптан）。

「黑卡爾梅克」的詞義，如帕拉斯（Peter S. Pallas）所說，「卡爾梅克」源自韃靼語 Chalimak，指「被分離者」或「滯留者」。<sup>13</sup> 伯希和（Paul Pelliot）考察突厥語義，修正為「留下來」，認為該詞作為部落名稱，在十四世紀便已出現。<sup>14</sup> 不過，「黑」作何解釋，令人費解。伯希和徵引西伯利亞史學家費舍爾（J. E. Fischer）之觀點，認為「卡爾梅克」有「高帽」（Qalpaq）之義，突厥人以 Qara qalpaq（黑色高帽）作為異教徒標誌，是以頭飾指代族群名稱。<sup>15</sup> 霍渥斯（H. H. Howorth）亦持此說，稱帖良古惕人（Telenguts）與蒙古特人（Manguts）因為帽子顏色不同，被分別稱為「白卡爾梅克人」和「黑卡爾梅克人」（Kara kalpaks）。<sup>16</sup> 巴托爾德進一步指出，中亞穆斯林將操突厥語的帖良古惕人稱為白卡爾梅克人，將西蒙古人稱為「黑卡爾梅克人」（Кара калмак）。<sup>17</sup> 蓋因突厥語彙 qara / kara 廣泛分佈於阿爾泰語系，指代黑色，<sup>18</sup> 俄語也有痕跡，譬如西遼便寫作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каракитаев，即喀喇契丹（黑契丹）國。不過，俄國檔案將「黑卡爾梅克人」寫作 Черные / Чёрные калмыки，Черные 原形為 Черный，義為「黑色的」，取代外來詞 кара。借自突厥語的 калмак 第二個元音字母 а 被俄語字母 ы

<sup>12</sup> Слесарчук Г. И. *Русско-мого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685-1691: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кая Фирма,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РАН, 2000, № 102, с. 269. 莊吉發指出「清高宗平定準噶爾後，改伊里為伊犁，以寓犁庭掃穴之意」，故本文涉及 ili、или 等詞，皆以乾隆二十四年（1759）為限，分別譯作「伊里」和「伊犁」，參莊吉發，《清代準噶爾史料初編》（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3），頁 2。

<sup>13</sup> 帕拉斯著，邵建東、劉迎勝譯，《內陸亞洲厄魯特歷史資料》（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頁 5。

<sup>14</sup> 伯希和著，耿昇譯，《卡爾梅克史評注》（北京：中華書局，1994），頁 27。

<sup>15</sup> 伯希和，《卡爾梅克史評注》，頁 27。

<sup>16</sup> Henry H. Howorth, *History of the Mongols from the 9<sup>th</sup> to the 19<sup>th</sup> Century*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876-1888), vol. 1, p. 427.

<sup>17</sup> Бартольд В. В. Калмыки. *Сочинения*. Т.5.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68, с. 538.

<sup>18</sup> 突厥語 кара 亦借入蒙古語，參見 Владимирцовъ Б. Я. Турецкие элементы въ Монгольскомъ языкъ. *Записки восточнаго отдѣлен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аго Русскаго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аго Общества* Т. 20. В. 2-3. С. Петербург, 1911, с. 156.

取代，輔音詞尾添加代表複數的 и，作為集體名詞。<sup>19</sup> 顯然在一六九〇年前後，經過俄語改造的 Черные / Чёрные калмыки 成為對準噶爾汗國屬人的官方稱呼。

檔案內，「蒙古人」作 Мунгалы，是 Монголы 的不規範寫法。同時期俄文檔案裡，「蒙古人」多指喀爾喀人。康熙二十八年底，噶爾丹率軍離開科布多，開始他的第二次東征，此處的「蒙古人」無疑是喀爾喀人。至於「和碩特」含義並不明朗，俄文作 кушоуты，詞尾 ы 表複數，指四衛拉特中的和碩特部。當時和碩特已一分為三：崇禎十二至十四年（1639-1641）衛拉特貴族遠征西藏後，由顧始汗率領的和碩特貴族駐牧庫庫諾爾（köke naγur，漢譯青海），並在拉薩設汗庭，稱為「大和碩特」。留居故地的和碩特部落又稱「小和碩特」，在康熙十六年（1677）噶爾丹征服和碩特的內戰後，復分為兩部：逃往甘肅邊牆迤北游牧的部落，被清朝稱為「西套」厄魯特，餘則歸附噶爾丹。<sup>20</sup> 從策妄阿喇布坦逃亡路線看，既非南下庫庫諾爾，亦非東投甘肅，所以 кушоуты 的確切含義還需要再辨析。

吉爾吉斯人稱，策妄阿喇布坦擊敗追兵後，在 Оле-реке 一帶游牧。從俄語句法看，Оле-реке 其實是 Ола-река 的前置格，река 義為河流，而 Ола 實指河名。筆者最初認為 Ола-река 是 или-река（伊里河）的不規範寫法，但兩者讀音差異顯著。

鑒於古俄語用詞靈活的特點，筆者認為 Ола-река 或指伊里河，或為注入阿拉湖的額敏河之代稱。俄曆一九九年（1691）策妄阿喇布坦（俄文作 Чеган Араптан）派往托木斯克堡（Томского）的使者稱，策妄阿喇布坦正在從前噶爾丹游牧的 речке Имиле 游牧。<sup>21</sup> речке Имиле 仍然屬於前置詞格，原形為 речка Имил。Речка 義為「河、溪」，Имил 源自突厥語舊稱「也迷里」，即「也迷里河」，實指額敏河。烏雲畢力格認為，阿拉湖、額敏河與額爾齊斯河在十七世紀七十年代前是和碩特牧地。<sup>22</sup> 那麼，кушоуты 實指在舊屬和碩特的牧場游牧的部落，而非庫庫諾爾或西套的和碩特部落。

<sup>19</sup> 十七至十八世紀的俄文與現代俄文不同，許多語法現象雖已出現，但未形成固定規則，須謹慎對待。這一階段的俄文概況，請參 Сорокин Ю. С.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Лексике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X VIII века*.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65, с. 5-41.

<sup>20</sup> 烏雲畢力格，〈17世紀衛拉特各部游牧地研究〉，《西域研究》2010.2：37；馬大正、成崇德，《衛拉特蒙古史綱》（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頁259-261。

<sup>21</sup> Слесарчук Г. И. *Русско-мого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685-1691*. № 142, с. 355.

<sup>22</sup> 烏雲畢力格，〈17世紀衛拉特各部游牧地研究〉，頁35-51。

張建

由是觀之，康熙二十七年（1688）噶爾丹以科布多為根據地，除預備討伐喀爾喀外，也有躲避饑荒的考慮。策妄阿喇布坦也在軍中，在康熙二十八年才離開噶爾丹，並未藏身吐魯番。策妄阿喇布坦回衛拉特故地後，除駐牧博羅塔拉外，常去額敏河流域游牧，這兩處都是被噶爾丹奪去的和碩特牧場，所以在吉爾吉斯部落中流傳他投奔和碩特的說法。

俄國檔案的記載，與若松寬引用的史料形成互證，落實了一六八九年說，成為準噶爾汗國早期史的研究基石。不過，若松寬僅得出策妄阿喇布坦在博羅塔拉游牧的結論，沒提到他在額敏河流域的牧場。另外，若松寬未曾考證波茲德涅耶夫「吐魯番說」的源頭。

波茲德涅耶夫提出一六七八年說（吐魯番說）的依據有二：一是康熙四十一年（1702）清使 Боочжу 的出使紀錄；二是援引中亞史學者瓦利漢諾夫（Ч. Ч. Валиханов）的觀點，認為噶爾丹佔領「小布哈拉」的「六城」時，未取忠於中國的吐魯番，它能給幼年的策妄阿喇布坦提供庇護。<sup>23</sup>

若松寬質疑清使 Боочжу 出使紀錄的真實性，認為 Боочжу 是旗人保住，清朝史料沒有他在這年出使的記載。其實，內閣滿文檔案分明記載保住出使之事，翻譯如下：

aikabade anagan arame burakū oci. g'aldan i harangga ele urse be bi urunakū nenehe songkoi leHEME gaimbi. tere erinde sini utala aniya ginggun ijishūn i yabuha gūnin mekele ombi. uttu ofi. hiya kesitu. aisilakū hafan booju de hesei bithe jafabofī（原文如此，應為 jafabufi—譯者注） takūraha. hese wasimbure doroi kesi isibume hacingga suje juwan šangnaha. erei jalin cohome wasimbuha.

譯文：倘若託辭不交，朕必將噶爾丹之屬眾，照前追索。屆時，爾多年恭順行走之心皆屬徒勞。是以，遣侍衛克什圖、員外郎保住頒旨，伴敕之禮，加恩賞賜各色緞十疋。<sup>24</sup>

該檔案是康熙四十一年九月，給策妄阿喇布坦的上諭抄件。anagan arame burakū 中的 burakū，是滿文 bumbi 的否定式，義為「不交」、「不給」。因為這年噶爾

<sup>23</sup> Веселовский Н. И. Посольство к зюнгарскому Хунтайджи Цэван Рабтану капитана от артиллерии Ивана Унковского и путевой журнал его на 1722-1724. с. 252.

<sup>24</sup> 頒賜策妄阿喇布坦敕諭（康熙四十一年九月十八日），「內閣蒙古堂檔」（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康熙四十一年檔。

丹的舊屬，墨爾根岱青之孫阿喇布坦，上諭寫作丹津喇布坦 (danjin rabtan) 降清，策妄阿喇布坦派策零敦多布「從朕之卡倫處，劫取丹津喇布坦之男女、牲畜」(mini karun i baci danjin rabtan i hehe juse ulga be durifi gamahabi)。<sup>25</sup> 康熙帝令其歸還，否則就要追索「噶爾丹之屬眾」，即康熙三十六年 (1697)，策妄阿喇布坦俘虜的吳爾占紮布 (urjanjab)、色楞 (sereng)、阿巴 (aba) 宰桑及其部曲。康熙三十七年策妄阿喇布坦稱「我之人力甚微，哈薩克等輩俱興戎於我」(mini niyalma hūsun umesi komso. hasak i jergi urse. gemu mini baru dain)，以對付異教徒哈薩克的名義，請求將這批人留給他，得到康熙帝默許。<sup>26</sup> 可見，康熙帝遣使準噶爾，是為解決阿喇布坦屬人問題。

清使之一名為 booju，滿語兩個元音 o 疊加，讀作 [au]，清輔音 j 與元音 u 相拼，讀作 [tsu]。波茲德涅耶夫所說的 Боочжу，輔音 ч、ж 與元音 y 相拼，亦讀 [tsu]，如「滿洲」俄文寫作 Маньчжурия。看來這位 booju 與 Боочжу 是同一個人。他在康熙三十五年八月任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ejeku hafan，漢譯理藩院主事，<sup>27</sup> 此時已陞至員外郎。鑒於理藩院職缺由八旗滿洲、蒙古人充補，這位 booju 確係若松寬所說的旗人保住。他從康熙二十五年 (1686) 起屢次出使蒙、藏，經驗豐富。<sup>28</sup>

可是，雖然保住出使一事並非子虛烏有，相關記載卻少得可憐。已公開的內閣與宮中檔案，非但未收錄他報告出使事宜的奏摺，連策妄阿喇布坦的回奏也付之闕如。惟有康熙四十二年 (1703) 上諭載，策妄阿喇布坦將丹津阿喇布坦 (danjin arabtan) 的屬人交出，龍顏大悅，再遣克什圖、保住赴準噶爾，賞賜策妄阿喇布坦御用之物。<sup>29</sup> 保住頻繁出使準噶爾，定有奏摺存留，可能被歸入「一史館」新發現的「朱批奏摺人名包」。至於波茲德涅耶夫所云保住出使紀錄的下落，實難稽考。

<sup>25</sup> 頒賜策妄阿喇布坦敕諭 (康熙四十一年九月十八日)，「內閣蒙古堂檔」，康熙四十一年檔。「牲畜」滿文應為 ulha，而非 ulga，但這一寫法在清初檔案中較常見。

<sup>26</sup> 策妄阿喇布坦使者雲端格隆口奏 (康熙三十七年八月初三日)，「內閣蒙古堂檔」，康熙三十七年檔。

<sup>27</sup> 頒賜達賴汗敕諭 (康熙三十五年八月初八日)，「內閣蒙古堂檔」，康熙三十年奏敕。本件檔案時間是康熙三十五年，卻被誤入康熙三十年奏敕內。

<sup>28</sup> 寶音特古斯，〈十八世紀初期衛拉特、西藏、清朝關係研究——以「六世達賴喇嘛事件」為中心〉(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蒙古學研究中心博士論文，2009)，頁 17。

<sup>29</sup> 頒賜策妄阿喇布坦敕諭 (康熙四十二年十月十日)，「內閣蒙古堂檔」，康熙四十二年檔。

張建

所幸，「一史館」編譯的《雍正朝滿文朱批奏摺全譯》收錄雍正二至三年(1724-1725)出使準噶爾的內閣學士眾佛保所進奏摺，內有三件篇幅極長，使者行程、談判情況、閒談情形，以及每日供支等無所不包，與翁科夫斯基出使時間前後銜接，是研究準噶爾汗國史的珍貴史料。其中有兩條紀錄，為勾畫策妄阿喇布坦的早年生活軌跡提供了有力依據。

其一是雍正二年七月二十日，策妄阿喇布坦向清使敘述他的少年生活：

爾等皆係大皇帝登極之後初次派來之使臣，可將我之履歷告知於爾等。在我很小之時，我父被眾叔父戕害後，我便成為孤獨之人。長大之後，打獵時因槍走火，眼睛失明，即依附於叔父噶爾丹博什克圖。噶爾丹心懷惡意，殺害我胞弟，強佔我定親之妻，又有意殺害我，企圖霸佔全部所有。我發覺之後，僅帶七人，騎馬逃跑。<sup>30</sup>

這段話出自策妄阿喇布坦之口，未經修飾，保留了更多細節，可惜未附滿文原文。「我父」指巴圖爾琿台吉第五子僧格，「眾叔父」指康熙十年發動叛亂，戕殺僧格的巴圖爾琿台吉長子車臣、次子卓特巴巴圖魯。次年，噶爾丹收平內亂，統治準噶爾部眾。

若松寬認為，策妄阿喇布坦因年幼失怙，依附噶爾丹，但沒有說明史料來源。可是，策妄阿喇布坦自稱在僧格死後，淪為「孤獨之人」。也就是說，策妄阿喇布坦喪父後，仍保持獨立地位，只是因為成年後槍傷及目，才被迫依附噶爾丹。

策妄阿喇布坦的「定親之妻」，即鄂齊爾圖車臣汗的孫女阿海，被噶爾丹搶去，是在康熙十八年。康熙二十七年，其弟索諾木阿喇布坦被噶爾丹殺害。次年，策妄阿喇布坦逃離科布多汗庭。按若松寬考訂的年譜推算，康熙十八年，策妄阿喇布坦十四歲，虛歲十五歲，他應於此年之前投靠了噶爾丹，之後十年都依附噶爾丹生活。所以，說策妄阿喇布坦在康熙十八至二十八年間，為躲避噶爾丹藏身吐魯番，恐怕是靠不住的。

然而，眾佛保從準噶爾人處得知，策妄阿喇布坦的確曾住在吐魯番：

渾台吉年輕時，從噶爾丹博碩克圖處逃出後，至吐魯番住有多年。當時尚未娶妻，良莠不分，常欺回子之女，故染有楊梅瘡，雖經調治，未能根除，自肛門至睾丸之間生有許多瘡，已破口流膿液。每年皆復犯。胯下紅

<sup>30</sup> 內閣學士眾佛保等奏報與策妄阿喇布坦議界摺（雍正三年正月初二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譯，《雍正朝滿文朱批奏摺全譯》（合肥：黃山書社，1998），上冊，頁1010。

腫，嗓子失音，牙床亦腫，受罪非淺。<sup>31</sup>

告知清使的準噶爾人叫羅卜藏朋蘇克，本為和碩特人，其母是喀爾喀博貝貝勒之姊，故羅卜藏朋蘇克意欲投清，知無不言。「渾台吉」即蒙古語 *qung tayiji*，指策妄阿喇布坦。破解謎題的關鍵，是落實策妄阿喇布坦脫離噶爾丹，移住吐魯番，以及他娶妻的時間。策妄阿喇布坦於康熙二十八年逃出科布多，已經證實。佔領吐魯番的年份，《咱雅班第達傳》稱，是康熙二十九年，<sup>32</sup> 與「逃出」時間相去不遠。唯有娶妻時間尚難確定。根據這條史料，可推斷出他在吐魯番居住的年份，對落實他的早年生涯意義重大。

翁科夫斯基日記提到，策妄阿喇布坦的髮妻是 *Гюнгү Араптан*，是庫庫諾爾某台吉之女。<sup>33</sup> 其實，這位 *Гюнгү Араптан* 並非台吉之女，而是「大和碩特」達賴汗之女貢噶喇布坦。其人首次見諸史冊，是在藏曆鐵猴年（康熙十九年，1680）的新年喜宴，並於閏六月初一，接受了五世達賴的摩頂加持。<sup>34</sup> 據若松寬考證，策妄阿喇布坦長子，威震中亞的噶爾丹策零出生在康熙三十四年。<sup>35</sup> 拉薩教廷在康熙三十三年向策妄阿喇布坦作出巨大讓步。貢噶喇布坦大概就在那時前往準噶爾，與策妄阿喇布坦完婚，結束了他的浪子生涯。所以，策妄阿喇布坦居住吐魯番的時間，大概在康熙二十九至三十三年。

「小布哈拉」，俄文作 *Малая Бухария*，與 *Большая Бухария*（大布哈拉，即布哈拉汗國）相對，指天山南部的綠洲城市。「六城」俄文作 *Алтышар*，源於突厥語 *Altäshahr*。瓦利漢諾夫認為「六城」指喀什噶爾、英吉沙、葉爾羌、和闐、阿克蘇與烏什（*Уч-Труфан*），庫羅帕特金（*Алексей Н. Куропаткин*）修正為喀什、英吉沙、葉爾羌、和闐、阿克蘇與庫車，<sup>36</sup> 固然不包括吐魯番。可是，噶爾丹在

<sup>31</sup> 內閣學士眾佛保等奏報策妄阿喇布坦內部信息事摺（雍正三年正月初二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雍正朝滿文朱批奏摺全譯》上冊，頁 1022。

<sup>32</sup> 喇德納巴德喇著，成崇德譯，《咱雅班第達傳——月光》（北京：全國圖書館縮微文獻複製中心，1990），頁 60。

<sup>33</sup> Веселовский Н. И. Посольство к зюнгарскому Хунтайджи Цэван Рабтану капитана от артиллерии Ивана Унковского и путевой журнал его на 1722-1724. с. 186.

<sup>34</sup> 阿旺洛桑嘉措著，陳慶英、馬連龍、馬林譯，《五世達賴喇嘛傳》（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7），頁 1168, 1200。

<sup>35</sup> 若松寬，〈ジュンガル汗位繼承の一経緯——ツェワン・ドルジ・ナムジャルからダワチまで〉，《田村博士頌壽東洋史論叢》（京都：田村博士退官記念事業會，1968），頁 648。

<sup>36</sup> Валиханов Ч. Ч. О состоянии Алтышаара или шести восточных городов Китайской

張建

康熙十八年就迫使吐魯番淪為其附庸，比征服喀什、葉爾羌等城還早一年。<sup>37</sup> 現在看來，波茲德涅耶夫的觀點自然有問題，但他最早指出策妄阿喇布坦曾在吐魯番生活，仍有不可磨滅的貢獻。

至於策妄阿喇布坦因濫交染上的「楊梅瘡」，在他晚年惡化，破潰流膿，導致「胯下紅腫，嗓子失音，牙床亦腫」，併發症蔓延至雙腿、喉部和口腔。按現代醫學判斷，屬梅毒 (syphilis) 感染。這一陳年宿疾，在盤尼西林 (penicillin) 問世前，是不治之症。晚年的策妄阿喇布坦不勝其苦，每逢發作，輒「於各拉藏（應為拉倉，即寺院）召集眾喇嘛，晝夜誦經禱祝」，<sup>38</sup> 希望以宗教力量化解災厄。甚至「取下回子卵根子噓烤」，<sup>39</sup> 以男性穆斯林生殖器為餌，冀以祛病還陽，但皆屬徒勞。雍正二年，他還不滿花甲，卻已淪為「臉色焦黃，耳朵甚背，上下牙掉落，僅剩四個」的衰弱老翁。<sup>40</sup> 吐魯番恣意淫樂的歲月，給他的肉體烙下深刻印痕。

總之，策妄阿喇布坦在康熙十年失怙後，過著流浪生活，後因槍傷及目，在康熙十八年之前投奔噶爾丹。康熙二十八年，他從科布多逃亡準噶爾，次年奪取吐魯番後，曾在此居住，直到康熙三十三年完婚為止。波茲德涅耶夫的「吐魯番說」決非信口雌黃，不可全盤否定。

## 二·策妄阿喇布坦襲擊科布多考

噶爾丹在康熙二十七年將汗庭東遷科布多，作為經略喀爾喀的大本營。此地「路接奇林，與庫里野圖路口相近，水草好，有大河」，<sup>41</sup> 奇林 (kirin)，一作

---

провинции Нан лу (малой бухарии) в 1858-1859гг.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6, с. 354; 庫羅帕特金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譯，《喀什噶爾》（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頁 96。

<sup>37</sup> 魏良弢，《葉爾羌汗國史綱》（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4），頁 143。

<sup>38</sup> 內閣學士眾佛保等奏報策妄阿喇布坦內部信息事摺（雍正三年正月初二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雍正朝滿文朱批奏摺全譯》上冊，頁 1022。

<sup>39</sup> 靖逆將軍富寧安奏報庫車歸順回子及所獲厄魯特人情事摺（雍正二年三月二十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雍正朝滿文朱批奏摺全譯》上冊，頁 727。

<sup>40</sup> 內閣學士眾佛保等奏報與策妄阿喇布坦議界摺（雍正三年正月初二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雍正朝滿文朱批奏摺全譯》上冊，頁 1021。

<sup>41</sup> 靖邊大將軍傅爾丹奏（雍正九年三月初六日），「軍機處漢文錄副奏摺」（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03-0012-001，001-0958。

「奇蘭」，與庫里野圖 (kuriyetu) 路分居南北，均為穿越阿爾泰山之大道。「大河」指科布多河。科布多之西，是庫里野圖、奇林二處通衢，又有河流，水草豐美，向東就是喀爾喀，堪稱形勝之地。<sup>42</sup>

策妄阿喇布坦起兵後，曾突襲科布多，奪取了噶爾丹的屬眾。此舉令噶爾丹元氣大傷，是導致他失敗的重要原因。這次襲擊在內亞史上的意義，並不遜於烏蘭布通、昭莫多諸役，但有價值的研究卻寥若晨星。慧眼獨具的茲拉特金、若松寬二先生雖致力於考證此役，卻各執一詞，得出了截然相反、訛奪充斥的結論。前者將此役與策妄阿喇布坦擺脫噶爾丹追兵的烏蘭烏蘇之戰混為一談，後者更得出策妄阿喇布坦曾兩度攻擊科布多，將噶爾丹之妻阿努劫走的觀點，殊屬非是。

造成上述亂象的原因，並非前輩學者能力欠缺，而是他們受冷戰鐵幕的桎梏，無法獲得充足的一手史料，只能在「間接史料」的暗夜裡摸索真相。然而，若想還原此役的實態，非但不能僅靠「間接史料」，就是單憑滿文或俄文檔案也是不夠的，惟有綜覽檔案，與「間接史料」對勘，方能窺其堂奧。

茲拉特金認為，策妄阿喇布坦在一六八九年攻打了噶爾丹的兀魯思。<sup>43</sup>「兀魯思」俄文作 Улус，即蒙古文 ulus，義謂「國家、部落聯盟」。康熙二十八年，噶爾丹以科布多為汗庭，策妄阿喇布坦進攻的「兀魯思」實指科布多。可是，茲拉特金的一六八九年說，是基於波茲德涅耶夫的錯誤推算。史料依據，則來自《親征平定朔漠方略》：

噶爾丹敗於策旺拉卜灘，下人散亡略盡。又極饑窘，至以人肉為食。<sup>44</sup>  
若松寬認為，這條史料指噶爾丹獲悉策妄阿喇布坦遁去，追擊失利的烏蘭烏蘇之戰，但僅是推測，未作考證。<sup>45</sup> 這段話源自理藩院尚書阿爾尼的奏報，出自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康熙帝致達賴喇嘛敕諭。「阿爾尼」滿文為 arani，漢文一作「阿喇尼」。<sup>46</sup> 這年六月，清朝派他出使科布多，掌握了叔侄反目之訊。單憑這

<sup>42</sup> 科布多實乃兵家必爭之地。康熙末年，清軍進取準噶爾，即屯兵於此。雍正九年 (1731)，清朝在科布多築城，作為西征的橋頭堡。張建，〈和通泊之役與大清國的邊務危機——以軍機處滿文檔案為中心的考察〉，《紀念王鍾翰先生百年誕辰學術文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3），頁 448-450。

<sup>43</sup> 茲拉特金，《準噶爾汗國史 (1635-1758)》，頁 271。

<sup>44</sup> 溫達等纂，《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康熙四十七年 [1708] 刻本，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卷五，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辛未，頁 44a。

<sup>45</sup> 若松寬，〈ツェワン・アラブタンの登場〉，頁 61。

<sup>46</sup> 馬齊等，《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卷一四三，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辛未，頁 577。

張建

條史料，會令人以為噶爾丹被策妄阿喇布坦重創，部下離散，食不果腹，行將崩潰，但不足以作為策妄阿喇布坦討伐科布多的證據。倘若噶爾丹窘迫如此，何能在年底東征時動員三萬餘人的大軍？

其實，滿文本《親征平定朔漠方略》的記載，便與漢文本有異：

g'aldan. ts'ewang rabtan de gidabufi. fejergi urse samsime wajire isika bime. geli umesi yuyume niyalmai yali jetere de isinahabi sembi.

譯文：噶爾丹被策妄阿喇布坦擊敗，屬眾至於離散死亡。又甚饑餒，至以人肉為食。<sup>47</sup>

內閣全宗裡的敕諭原文為：

g'aldan bošoktu. ts'ewang rabtan de gidabufi. fejergi urse samsime wajire isika bime. geli umesi yuyume niyalmai yali jetere de isinahabi sembi.

譯文：噶爾丹博碩克圖被策妄阿喇布坦擊敗，屬眾至於離散死亡。又甚饑餒，至以人肉為食。<sup>48</sup>

清人編纂《親征平定朔漠方略》滿文本時，視噶爾丹為大逆，刪去「博碩克圖」汗號，餘俱不改，故與敕諭相去不遠。不過，翻譯漢文本時，史官耍了花招，次句 fejergi urse samsime wajire isika bime 與首句為遞進關係，本義指噶爾丹被策妄阿喇布坦擊敗，參戰的屬眾或四散，或殞命。史官先將不及物動詞 isika（漢義「至、至於」）忽略，又在「散亡」後加上「略盡」二字，誇大其辭，給人造成噶爾丹損失慘重，行將土崩瓦解的印象。

通過文本比勘可知，康熙二十八年，噶爾丹的確為策妄阿喇布坦所敗，但損失不像漢文《方略》吹噓的那樣慘重，至於大本營科布多被討伐，就更談不上了。所以，這場衝突實指烏蘭烏蘇之戰。是役，噶爾丹僅投入兩千人馬，損失不會太大。這時他的力量還很雄厚，策妄阿喇布坦不會冒險進攻科布多。茲拉特金的觀點實難成立。

真正給噶爾丹造成嚴重打擊的，是策妄阿喇布坦對科布多的突襲。若松寬認為，策妄阿喇布坦曾兩次襲擊科布多。一六九〇年，他趁噶爾丹東進，洗劫科布多。一六九〇至一六九一年，他再次進攻科布多。<sup>49</sup> 他認為策妄阿喇布坦在一六

<sup>47</sup> 溫達等纂，《親征平定朔漠方略（滿文本）》（康熙朝內府精寫本，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卷五，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辛未，頁 52 a。

<sup>48</sup> 頒賜達賴喇嘛敕諭（無年月），「內閣蒙古堂檔」，康熙二十八年奏敕。

<sup>49</sup> 若松寬，〈ツェワン・アラブタンの登場〉，頁 62-64。

九〇年襲擊科布多的觀點，有兩條史料依據，一是噶爾丹舊部丹巴哈什哈之語：

噶爾丹至烏蘭布通後，策旺喇卜灘盡收噶爾丹之妻子、人民而去。<sup>50</sup>

僅看漢文，自然會認為，噶爾丹於康熙二十九年七月進抵烏蘭布通，策妄阿喇布坦就在那時將噶爾丹留在科布多的女眷、人民劫取。不過，滿文本與之有異：

g'aldan i ulan butung de jihe amala. ts'ewang rabtan. g'aldan i juse sargan jušen  
be. gemu bargiyafi gamaha kimun bi.

譯文：噶爾丹來烏蘭布通後，策妄阿喇布坦將噶爾丹的子女人民俱收取，  
有此仇怨。<sup>51</sup>

互勘滿、漢文本，會發現兩個問題。一是丹巴哈什哈之語的動詞是 jihe，是 jimbi 的過去時態，漢義「來」，而非 isika / isimbi 或帶方向態的 isinjimbi（漢義「至」、「來至」）。所以 g'aldan i ulan butung de jihe amala 這句話的時間範圍很廣，可泛指從康熙二十八年東進，到烏蘭布通戰役，甚至退回喀爾喀的任何年月，並不能確定策妄阿喇布坦襲擊科布多的時間。二是漢文本的「妻子」，滿文寫作 juse sargan，即「子女」。

另一處佐證，是《欽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康熙二十九年條：

策妄阿喇布坦偵噶勒丹侵喀爾喀，潛兵至科布多，掠噶勒丹妻阿努及牲畜去。<sup>52</sup>

可是，這條史料起碼存在三個問題。一是僅提到策妄阿喇布坦趁噶爾丹東進，襲擊科布多，卻沒說明具體時間，只是修書者將其記入康熙二十九年罷了。二是噶爾丹妻子阿努 (anu) 並非策妄阿喇布坦掠去，後文將作考證。三是《欽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纂於乾隆五十三年 (1788)，距噶爾丹東進已近百年，屬後出文獻。因此，想釐清策妄阿喇布坦征討科布多的時間，先要做好考據，第一步就是落實丹巴哈什哈所稱，被策妄阿喇布坦擄去的，噶爾丹的「子女」(juse sargan) 之身分。

滿文 juse 其實也是集體名詞，有「孩子們」的含義。已知噶爾丹有二子二女，除長女嫁與庫庫諾爾和碩特部博碩克圖濟農之子根特爾外，長子塞卜騰巴兒珠爾在康熙三十六年被哈密伯克押送京師，次子車凌三魯普和次女鍾齊海在噶爾

<sup>50</sup>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二七，康熙三十五年七月戊午，頁 10a。

<sup>51</sup>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滿文本）》卷二七，康熙三十五年七月戊午，頁 14 b。

<sup>52</sup> 祁韻士等纂，《欽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第 454 冊），卷七七，頁 688。

張建

丹死後，隨丹濟喇游牧，被策妄阿喇布坦截獲，陸續解京。<sup>53</sup> 所以，策妄阿喇布坦攻打科布多時，並未獲得噶爾丹的子女。那麼，丹巴哈什哈所說的 *juse* 又是指誰？

一六九一年，策妄阿喇布坦派往托木斯克的使者稱：

譯文：博碩克圖汗 (Бошту-хана) 最小的弟弟朋楚克達什 (Мунчук-Тайша)

帶著自己的兀魯思屬人游牧回台吉策妄阿喇布坦 (Чеган Араптан) 處。<sup>54</sup>

Бошту-хана 屬於單數名詞二格，原形 Бошту-хан，音譯「博什圖汗」。Хан 借自蒙古語，即「汗王」之義。俄國檔案中，Бошокту-хан (博碩克圖汗) 有多種變體，Бошту-хан 就是一種，所以這位「博什圖汗」就是博碩克圖汗噶爾丹。Мунчук-Тайша 屬於單數名詞四格，詞尾附加元音字母 *a*，原形是 Мунчук-Тайш，譯為「穆恩丘克岱什」或「孟楚克岱什」。他的真實身分，是巴圖爾琿台吉第十子朋楚克達什 (Пунсукъ-даши)，而非最小的達爾瑪。<sup>55</sup> 《咱雅班第達傳》載，策妄阿喇布坦在羊年 (1691) 襲擊科布多，奪取了朋楚克達什的牧地，他就在那時歸入其麾下。<sup>56</sup>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亦載：

g'aldan. ini fejergi yadara jušen be. danjin ombu de gaifi banji seme afabufi. ini beye. danjila. gelei guyeng. naicung ombu sebe gaifi. cooha be bargiyafi. hobdo i baci dergi baru kalka sabe dailaname genehe sembi.

譯文：噶爾丹將窮困屬民交丹津鄂木布帶領度日。他身率丹濟喇、格壘古英、奈沖鄂木布等，收聚兵丁，自科布多往東，去討伐喀爾喀。<sup>57</sup>

丹津鄂木布是策妄阿喇布坦的幼弟，忠於噶爾丹，當時還不到二十歲，後亦被策妄阿喇布坦帶回博羅塔拉。準噶爾軍出征，給養、馬匹需自備，故噶爾丹在第二次東征時，將無力參戰的屬眾留下，由丹津鄂木布等貴族統轄。<sup>58</sup> 丹巴哈什哈所

<sup>53</sup> 齊木德道爾吉，〈昭莫多之戰以後的噶爾丹〉，《蒙古史研究》4 (1993)：116-117；宮脇淳子，《最後の遊牧帝國：ジュンガル部の興亡》(東京：講談社，1995)，頁 53。

<sup>54</sup> Слесарчук Г. И. *Русско-мого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685-1691*. № 142, с. 356.

<sup>55</sup> 祁韻士等，《欽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卷八一，頁 722。

<sup>56</sup> 喇德納巴德喇，《咱雅班第達傳》，頁 60。

<sup>57</sup>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滿文本)》卷六，康熙二十九年三月甲寅，頁 14 a。

<sup>58</sup> 直到十八世紀初，準噶爾軍隊動員時，馬匹、給養仍靠自行置備。如雍正九年，備兵阿爾泰時，「二人一駝，每人馬三匹、米兩袋、羊二隻，俱各自攜帶，自牧場起行」(juwe niyalma emu temen. niyalma tome ilata morin. juwete fulhū bele. juwete honin. gemu meni meni nukte ci gaifi jurafi.)。順承親王亦稱準噶爾備戰時，「彼之屬眾俱靠自力」(ceni fejergi urse gemu beyei hūsun.)。靖邊大將軍傅爾丹奏(雍正九年六月十八日)，「軍機處滿文月摺檔

說的 juse 應指這些人，並非噶爾丹的子嗣。

若松寬認為，被策妄阿喇布坦收取的噶爾丹之妻是僧格遺孀阿努。她在僧格死後，嫁給了噶爾丹。然而，康熙二十九年（1690）春，內閣學士達虎（dahū）報告，阿努與策妄阿喇布坦站在了一起：

g'aldan. honggoroi baru dosinambihe. anu katun. ts'ewang rabtan sebe ceni da nuktera ba i baru nuktehe serebe donjifi. hobdo i bade dosinaha.

譯文：噶爾丹曾向洪郭壘前進，聞知阿努喀屯、策妄阿喇布坦等漸漸向其原游牧地遷徙，乃進於科布多地方。<sup>59</sup>

這條史料，是康熙二十九年三月，達虎拜會曾出使噶爾丹的西藏僧侶他賴堪卜（talai k'ambu）時，從他手下探得之訊。解讀本條史料的基礎，在於確定 honggoroi 之地望。honggoroi 在漢文文獻內譯名不一，或作「轟郭爾」，或作「洪郭壘」、「洪郭羅」。嘉慶《大清一統志》中「庫倫」條，云：「轟郭爾山，在訥拉特山東北」。按其輿圖，「轟郭爾山」坐落喀爾喀左翼中左旗之北，隔瀚海與烏拉特三旗相望。<sup>60</sup> 可是，噶爾丹兩次東進，是沿水草行軍，直趨克魯倫河，說他去戈壁邊緣的轟郭爾山，不合情理。

一七一六年（康熙五十五年），準噶爾擊退了彼得大帝派往葉爾羌的考察隊，前瑞典炮兵準尉列納特（J. G. Renat）被俘，直到一七三四年（雍正十二年）才回到瑞典。他帶回兩幅以準噶爾為中心的中亞地圖，二號圖的北端有一處旁標「471」的托忒文地名，俄國學者將其轉寫為 Хонгорой，其中 н<sub>г</sub> 代表俄語缺少的濁鼻音 [ŋ]，巴德利（John F. Baddeley）用英文轉寫為 Khonggoroi，與 honggoroi 或「洪郭壘」發音切近。此地位於唐努山北，克穆齊克河與小葉尼塞河交匯處西側，<sup>61</sup> 是否喀爾喀人所稱之 honggoroi，尚需考證。

康熙三十五年春，清軍北伐噶爾丹時，上諭西路主帥費揚古，喀爾喀的根敦

---

簿」（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靖邊大將軍、順承親王錫保奏（雍正十年二月二十三日），「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03-1138-007，025-1552。

<sup>59</sup>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滿文本）》卷六，康熙二十九年三月甲寅，頁 13b。

<sup>60</sup> 穆彰阿等纂，《大清一統志》（道光二十二年〔1842〕武英殿本，北京：北京圖書館藏），卷五三三，頁 2a。

<sup>61</sup> 列納特二號圖（烏普薩拉：烏普薩拉大學〔Uppsala Universitet〕圖書館藏）；巴德利著，吳持哲、吳有剛譯，《俄國·蒙古·中國》（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上卷，頁 431。

張建

戴青 (gendun daicing) 貝勒，已在 honggoroi 之內，毋錯認為敵。<sup>62</sup> 這位根敦戴青，俄文作 Дайчин Эрдени Батур，Эрдени 作為外來詞，де 不讀作 [tɛɛ]，而各讀其本音，應譯為「戴青額爾德尼巴圖爾」。柳澤明考證他是喀爾喀和托輝特部的根敦額爾克戴青，在噶爾丹首次東征時宣誓效忠沙皇，以圖自保。<sup>63</sup> 和托輝特牧地緊鄰西伯利亞，所以 honggoroi 在喀爾喀西北，而非東南。這一推測，有丹巴哈什哈之語為證：

oros de genere honggoroi han sere juwe jugūn bi

譯文：去俄羅斯，有名為洪郭壘、罕兩條路。<sup>64</sup>

昭莫多之戰後，噶爾丹屬下分崩離析，丹津鄂木布曾去 honggoroi 駐紮：

abdula erke jaisang oros i baci hūdašafi jidere be danjin ombu. okdofi honggoroi de gamaha abdula erke jaisang ni emgi hūdašafi arabtan i hoise be danjin ombu arabtan de sindafi unggihebi.

譯文：丹津鄂木布將從俄羅斯處來貿易的阿卜都喇額爾克宰桑迎取至洪郭壘，將與阿卜都喇額爾克宰桑一同做買賣的阿喇布坦的回子，丹津鄂木布已發遣（給）阿喇布坦。<sup>65</sup>

阿卜都喇額爾克宰桑是忠於噶爾丹的穆斯林頭目，曾於康熙二十九年率商隊，赴歸化城貿易。<sup>66</sup> 他率領商隊自俄國返回，被丹津鄂木布邀截至 honggoroi，拆散其商隊。此舉令噶爾丹愈發日暮途窮。不過，丹津鄂木布未在此久居。康熙三十六年三月，準噶爾降人稱：

danjin ombu konggoroi de tehe bihe konggoroi ci casi genehe seme uranghai ursei alaha gisun be donjiha sembi

譯文：聽烏梁海人告訴說：丹津鄂木布曾在洪郭壘居住，後來去洪郭壘那邊了。<sup>67</sup>

<sup>62</sup>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滿文本）》卷二〇，康熙三十五年二月壬寅，頁 24a。

<sup>63</sup> 柳澤明，〈ガルダソのハルハ侵攻（一六八八）後のハルハ諸侯とロシア〉，《清朝と東アジア：神田信夫先生古稀記念論集》（東京：山川出版社，1992），頁 179-196。

<sup>64</sup>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滿文本）》卷二七，康熙三十五年七月戊午，頁 15 a。

<sup>65</sup> 大將軍費揚古等之奏章及咨文（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宮中檔康熙朝朱批奏摺》（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7），第八輯，頁 477-478。

<sup>66</sup>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六，康熙二十九年六月壬申，頁 24a。

<sup>67</sup> 撫遠大將軍費揚古等奏聞厄魯特人來降事（康熙三十六年三月十四日），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文獻編輯委員會，《宮中檔康熙朝朱批奏摺》第八輯，頁 731-732。

據噶爾丹屬人稱，丹津鄂木布是被迫離開：

danjin ombu modo honggoroi de genehe bihe. modo honggoroi i urse halbuhakū ofi. danjin ombu horonggoi ci tucifi wargi baru genehe sembi.

譯文：丹津鄂木布曾去茂岱洪郭壘，因茂岱洪郭壘之眾不納，丹津鄂木布自洪郭壘離開，往西去了，等語。<sup>68</sup>

其實，丹津鄂木布並非被迫西行，容另撰文考證。konggoroi 與 honggoroi 本為一地，蓋因滿文 ko-、go-、ho-以圈點相區分，檔案將圈點遺漏之故。modo 是蒙古語，指「樹木、森林」，modo honggoroi 音譯「茂岱洪郭壘」，即「森林洪郭壘」，形容附近地貌。uranghai 在雍正後寫作 uriyanghai，漢義「烏梁海」，即明之「兀良哈」，義為「林中之人」。modo honggoroi i urse（茂岱洪郭壘之眾）其實就是 uranghai。綜上所述，honggoroi 並非《一統志》所載之「轟郭爾山」，而是列納特二號圖中的 Хонгорой / Khonggoroi（洪郭壘），位於喀爾喀西北，薩彥嶺山陽的烏梁海牧地，有大路通俄羅斯。

明瞭 honggoroi 確指後，再研審這條史料，便可迎刃而解。噶爾丹移營洪郭壘的目的，或是向烏梁海部落徵稅，或是與俄國通使，商議東進之事。策妄阿喇布坦與阿努趁機逃往博羅塔拉，噶爾丹聞訊，趕回科布多。所以，前引喀爾喀人之語，其實是康熙二十八年，策妄阿喇布坦脫離噶爾丹的情況。阿努亦稱：

bošoktu han dalai lamai gisun ci（原檔脫漏—譯者注）yabufi sonom arabtan be waha.. jai ts'ewang arabtan. meni juwenofi de inu（原檔脫漏—譯者注）tuttu ofi. be. meni meni fakcaha. tereci coohalame genefi gaire isime.

譯文：博碩克圖汗違背達賴喇嘛之語而為非，殺害索諾木阿喇布坦。再，與策妄阿喇布坦、我等二人亦反目，是以各自分離，自此動兵而去，至於報仇。<sup>69</sup>

本條史料摘自康熙二十九年，阿努致康熙帝信件。原檔已沓爛，脫漏文字，但可據《親征平定朔漠方略》補足。首處脫漏為 jurceme waka be，be 的字尾在原檔內尚有殘留。jurceme 原形為 jurcemi，義為「違背」，waka 義為「非、過錯」，與 be yabufi 連用，乃「為非」之義。第二處脫漏為 ehereke，即「反目」。可見，阿努因噶爾丹謀害僧格子嗣，在那時便隨策妄阿喇布坦離開科布多，並藉助

<sup>68</sup> 員外郎博什希等奏聞抵達噶爾丹所居之地事（康熙三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文獻編輯委員會，《宮中檔康熙朝朱批奏摺》第八輯，頁 767-768。

<sup>69</sup> 阿努奏文（無年月），「內閣蒙古堂檔」，康熙二十九年檔。

張建

僧格妻子的身分，號召原屬僧格的部落支持策妄阿喇布坦。因此，丹巴哈什哈所稱，策妄阿喇布坦掠走的噶爾丹之「子女」(juse sargan) 只是泛指。若松寬僅憑漢文史料，將丹巴哈什哈之語中的 juse sargan 誤解為「妻子」，得出阿努被劫走的結論，並不屬實。

實際上，若松寬之所以認定策妄阿喇布坦兩次進軍科布多，是受《咱雅班第達傳》的影響。因為此書的馬年 (1690) 條記載：

博碩克圖汗歸來後，仍居科布多，策妄阿喇布坦將土魯番、輝特等部併入自己的管轄範圍。並於馬年出兵，於羊年 (1691) 仲春初一侵入汗的領地。<sup>70</sup>

若松寬視為證據的兩條前引史料，均稱策妄阿喇布坦趁噶爾丹不在，襲擊科布多，而《咱雅班第達傳》則聲稱策妄阿喇布坦在噶爾丹敗回後討伐科布多。所以若松寬的「兩次討伐說」，本質是將那兩條漢文史料與《咱雅班第達傳》比較，視噶爾丹在科布多與否得出的結論。然而，俄文檔案並不支持他的結論。

一九九年 (康熙三十年，1691) 七月，噶爾丹派曼濟 (Маньжи) 等出使托木斯克，談起策妄阿喇布坦襲擊科布多事：

譯文：博碩克圖汗來到蒙古領地的時候，把自己的汗庭 (ургу) 留在了科布多河 (речке Кобде)。博碩克圖汗離開汗庭後，策妄阿喇布坦來到了博碩克圖的汗庭，並攻下了汗庭。<sup>71</sup>

Ургу 原形為 урга，出自卡爾梅克語 Урга，義為「大帳」，即瑋台吉居處。在翁科夫斯基日記中，指策妄阿喇布坦直轄的人眾。本文譯為「汗庭」，即丹津鄂木布、朋楚克達什等管理的留守人馬。同月，策妄阿喇布坦派往托木斯克的使者瑪賚哈什哈 (Малай Кашка) 亦稱：

譯文：博碩克圖汗去攻打蒙古人，把自己的汗庭留在科布多河。他離開後，策妄阿喇布坦奪取了博碩克圖的汗庭。<sup>72</sup>

兩相對照，無論是噶爾丹抑或策妄阿喇布坦方面，均稱策妄阿喇布坦襲擊科布多，是在噶爾丹東征之後，並未與其叔當面交鋒。不過，為徹底糾正《咱雅班第達傳》之謬，還要利用俄文檔案，考察噶爾丹北歸後的牧地。

據一九九年四月六日，葉尼塞斯克 (Енисейск) 接色楞格斯克 (Селенгинск)

<sup>70</sup> 喇德納巴德喇，《咱雅班第達傳》，頁 60。

<sup>71</sup> Слесарчук Г. И. *Русско-мого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685-1691.* № 147, с. 360.

<sup>72</sup> Слесарчук Г. И. *Русско-мого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685-1691.* № 148, с. 361.

函稱，噶爾丹被清軍擊敗後，「位於距離涅爾琴斯克 (Нерчинск) 大約六天急行軍的路程」。<sup>73</sup> 涅爾琴斯克，即石勒喀河畔的尼布楚 (Нибучао)。噶爾丹當時在涅爾琴斯克西南，喀爾喀牧地上游牧。茲拉特金徵引噶爾丹舊屬之語，稱噶爾丹曾在 Ханай-олая 生活。<sup>74</sup> Ханай-олая 是俄語第二格，原形為 Ханай-олай。Ханай 詞根為 Хан，對應蒙語之 qayan。олай 即蒙古文之 ayula，桑席葉夫 (Гарма Д. Санжеев) 舉該詞為例，說明蒙古語彙摩擦音消失，元音延長的特點。<sup>75</sup> 從語音出發，結合上下文判斷，Ханай-олая 即西里爾蒙文中的 Хан-уул (汗阿林)，指喀爾喀中部，土拉河附近的汗山。所以，噶爾丹在康熙三十年春，仍在喀爾喀。

噶爾丹在烏蘭布通戰敗，北歸又遭遇瘟疫，三萬大軍僅剩三千，他在科布多的人畜又被策妄阿喇布坦奪取，十分窘迫。為了休養生息，他率餘部西遷，曼濟稱：

譯文：現在博碩克圖汗帶著自己的汗庭來到克穆齊克河 (реке Кемчике) 畔，距離吉爾吉斯人領地不遠。<sup>76</sup>

瑪賚哈什哈亦稱：

譯文：策妄阿喇布坦在察罕呼濟爾 (Чаган Кужуре) 游牧，而博碩克圖汗在克穆齊克 (Кемчике) 游牧。<sup>77</sup>

噶爾丹在 реке Кемчике 游牧，Кемчике 原形為 Кемчик，音譯「克穆齊克」，韓百詩 (Louis Hambis) 指出該詞源自突厥語，首見於十世紀。波斯史學家志費尼 (al Juwayni) 將其寫作 Kābčik，實為 Kāmčik，即克穆齊克河，是葉尼塞河上游支流。<sup>78</sup> Кемчик 前加 реке，是本土化的寫法。

克穆齊克河在唐努山陰，山南就是烏布蘇淖爾。噶爾丹在康熙二十八年東征前，曾向這裡的吉爾吉斯部落徵收兩萬頭牲畜。<sup>79</sup> 因此，他是想利用吉爾吉斯人

<sup>73</sup> Слесарчук Г. И. *Русско-мого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685-1691*. № 136, с. 344.

<sup>74</sup> 茲拉特金，《準噶爾汗國史 (1635-1758)》，頁 284。原檔參見 Слесарчук Г. И. *Русско-мого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685-1691*. № 150, с. 365.

<sup>75</sup> 桑席葉夫著，陳偉等譯，《蒙古語比較語法》(北京：民族出版社，1959)，頁 100。

<sup>76</sup> Слесарчук Г. И. *Русско-мого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685-1691*. № 147, с. 360.

<sup>77</sup> Слесарчук Г. И. *Русско-мого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685-1691*. № 148, с. 361.

<sup>78</sup> 韓百詩著，耿昇譯，〈謙河考〉，鄭炳林主編，《法國西域史學精粹》(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11)，頁 485-489。

<sup>79</sup> Слесарчук Г. И. *Русско-мого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685-1691*. № 135, с. 343.

張建

恢復元氣。康熙三十二年，清朝獲悉噶爾丹「現於烏郎塢處墾田」(ne ulangu i bade usin tarimbi)。<sup>80</sup>「烏郎塢」即烏布蘇淖爾南方的烏蘭固木 (ulan gum)。此處「水草豐茂，土壤肥沃，地亦平衍」(onggo muke elgiyen. boihon huweki. ba inu necin leli)，在康、雍兩朝成為清軍耕牧駐紮之所。<sup>81</sup>可見，噶爾丹的牧地不止限於克穆齊克河，還擴展到唐努山陽的烏布蘇淖爾。

至於 Чаган Кужуре 是蒙古語音轉，Чаган 即 čaγan，義為「白、白色」，漢語音譯為「察罕」，如蒙古人呼沙皇為 čaγan qaγan (白可汗)，漢文作「察罕汗」。Кужуре 原形為 Кужур，即 qujir，義為「鹹地」。Чаган Кужуре 本義是「白花花的鹽鹼地」，音譯「察罕呼濟爾」。《西域圖志》載此地屬塔爾巴哈台，「在鄂爾和楚克鄂拉北，綽爾郭西」。「鄂爾和楚克鄂拉」乃山名，在「綽爾郭」南，「綽爾郭」在烏蘭呼濟爾西。烏蘭呼濟爾是康熙五十九年清軍遠征準噶爾，深入之所，在雅爾 (yar) 東南。<sup>82</sup>故察罕呼濟爾應在雅爾與烏蘭呼濟爾之間，額米爾河流域之北。策妄阿喇布坦北上游牧，隔阿爾泰山與噶爾丹對峙。

綜上所述，茲拉特金認為策妄阿喇布坦在一六八九年攻打科布多，是將烏蘭烏蘇之戰與襲擊科布多相混淆。阿努喀屯早在一六八九年就隨策妄阿喇布坦行動，並非在科布多被俘。噶爾丹東征受挫後，從喀爾喀游牧到克穆齊克河流域，未歸科布多。《咱雅班第達傳》稱噶爾丹返回科布多，必屬訛誤。策妄阿喇布坦僅襲擊過科布多一次，就是趁噶爾丹東征未歸，掠走了留在那裡的人畜。具體時間，尚難斷定，姑且沿襲《咱雅班第達傳》的說法，定為羊年二月初一。所謂「第二次襲擊」純屬子虛，是若松寬在缺乏「直接史料」下作出的誤判。

### 三·策妄阿喇布坦遷徙「森林部落」探微

策妄阿喇布坦脫離噶爾丹後，侷促一隅，軍力單弱。對游牧部落而言，「控弦之士」，即騎射手多寡，決定武力強弱。擴展牧地，蒐集人丁，是策妄阿喇布坦的頭等急務。他蒐羅的人丁，不僅限於四衛拉特，而是來自準噶爾周邊多個族

<sup>80</sup>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滿文本）》卷一三，康熙三十二年九月己酉，頁 28b。

<sup>81</sup> 靖邊大將軍傅爾丹奏（雍正九年三月十九日），「軍機處滿文月摺檔簿」。

<sup>82</sup> 傅恒等纂，《欽定皇輿西域圖志》（乾隆四十七年〔1782〕武英殿本，北京：北京圖書館藏），卷一一，頁 9b-10b；張建，〈康熙五十九年烏蘭呼濟爾之戰淺探〉，《清史論叢》2012：81-82。

群。一七〇二年，他將以葉尼塞吉爾吉斯人為主的大批「森林部落」人丁遷往準噶爾，這一行動是策妄阿喇布坦崛起史上的標誌性事件，但相關研究卻很不充分，亟待考證。

若松寬對一六九一年策妄阿喇布坦的牧地範圍，有以下論述：

譯文：策妄阿喇布坦到一六九一年，以自己的根據地博羅塔拉為中心，控制了北到額爾齊斯河上游，東北到烏布蘇淖爾的整片地區。<sup>83</sup>

從俄文檔案看，策妄阿喇布坦的確在額爾齊斯河谷游牧。至於他控制烏布蘇淖爾的史料依據，仍源於後出的《欽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不過，上文談到，噶爾丹在烏蘭布通失利後，西歸克穆齊克河流域，藉助吉爾吉斯部落休養生息，又在烏蘭固木耕牧。所以，烏布蘇淖爾到唐努山脈，實乃噶爾丹之疆圍。那麼，策妄阿喇布坦崛起後，如何經略這片土地上，助噶爾丹東山再起的吉爾吉斯部落呢？

雍正二年，策妄阿喇布坦向清使追憶往昔，稱：

我獲悉噶爾丹於烏蘭布通兵敗後，復緣克魯倫河往西去，時因路不通，我即派名為沙克之人，乘騎駱駝，穿過戈壁，繞道哈密速奏。繼而我全收其游牧地堵截，噶爾丹大敗于昭莫多，無路可退而身亡。<sup>84</sup>

「沙克」即沙克海喇圖 (šak hairatu)，曾於康熙三十二、三十三年兩度使清。策妄阿喇布坦在康熙三十三年奏文內提到，「因途中擾亂，將沙克海喇圖輕裝派往」(jugūn de facuhūn ofi. šak hairatu be gabsihyalabume ungihe.)，就是指他乘駱駝越戈壁，繞道使清之事。<sup>85</sup> 所謂「全收其游牧地」應指奪取阿爾泰山脈東麓，唐努山脈南北之地，使噶爾丹無路可退。策妄阿喇布坦向眾佛保等人作如此語，別有深意，需反復推敲。

實際上，噶爾丹是自行撤離烏蘭固木的。康熙三十五年，策妄阿喇布坦奏稱：

duleke aniya jakūn biyade. g'aldan ci juwe mudan ukanju jifi alarangge. g'aldan duleke aniya niyengniyeri usin tarihakū. dergi baru nuktere de emu inenggi juwe mudan nukteme gidai fesin be sacime.

<sup>83</sup> 若松寬，〈ツェワン・アラブタンの登場〉，頁 64。

<sup>84</sup> 內閣學士眾佛保等奏報與策妄阿喇布坦議界摺（雍正三年正月初二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雍正朝滿文朱批奏摺全譯》上冊，頁 1010。

<sup>85</sup> 策妄阿喇布坦奏文（康熙三十三年閏五月），「內閣蒙古堂檔」，康熙二十九至四十年策妄阿喇布坦事務檔。

譯文：去年八月，自噶爾丹處逃人兩次來告：噶爾丹去年春天未耕田，東向游牧，每日遷徙兩次，斫制矛杆。<sup>86</sup>

噶爾丹在康熙三十四年春離開烏蘭固木東進。次年，他在昭莫多被清軍重創，一蹶不振，最終敗亡。不過，這時策妄阿喇布坦沒有囊括原屬噶爾丹的牧地。康熙三十六年正月，清使黑色 (heise)、馬尼圖 (manitu) 在布彥圖郭爾河 (buyantu gool bira) 頒敕阿喇布坦。<sup>87</sup> 二月，噶爾丹屬人向清使博西希 (bosih) 、常綏 (cangšeo) 稱：「阿喇布坦率他的屬人，在名曰布彥圖高爾的河」(arabtan ini fejergi urse be gaifi buyantu gool sere bira de bi)。<sup>88</sup> 「阿喇布坦」即前文提到的丹津阿喇布坦。「布彥圖高爾」滿文作 buyantu gool, gool 即蒙古語 γool, 義為「河流」，「布彥圖郭爾」即「布彥圖河」，在列納特二號圖標注為 Буйанту / Buyantu, 流經科布多。<sup>89</sup> 另外，前已考證，丹津鄂木布能自由出入唐努山陰，薩彥嶺南的洪郭壘。所以，策妄阿喇布坦在康熙三十六年初，並未控制科布多河一帶，遑論唐努山脈了。

策妄阿喇布坦向阿爾泰山以東，唐努山脈進軍，勢必要同散居南西伯利亞針葉林中，包括葉尼塞河與鄂畢河中上游，薩彥嶺、阿爾泰山內外的森林部落民打交道。清朝呼之為「烏梁海」(uriyanghai / uranghai / uranggan) 或「林國（森林部落）」(moo gurun), 俄人稱之為 Киргизы (吉爾吉斯)。十七世紀末至十八世紀初森林部落的情形，漢文史料極少，今人多引《欽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為據：

蓋和托輝特為喀爾喀極邊，西近厄魯特，北近俄羅斯，俗喜鬥。烏梁海復錯處其間，捕貂射獵，依木而居，納賦和托輝特。有事，則籍之為兵。<sup>90</sup>

此說將林間捕貂狩獵民統稱為「烏梁海」，概視為喀爾喀和托輝特部之屬民。然而，準噶爾巴圖爾琿台吉與喀爾喀札薩克圖汗曾就森林部落歸屬訂議，和托輝特

<sup>86</sup> 策妄阿喇布坦奏文（康熙三十五年正月），「內閣蒙古堂檔」，康熙二十九至四十年策妄阿喇布坦事務檔。

<sup>87</sup> 筆帖式黑色、王府長史馬尼圖等奏聞出使阿喇布坦情形（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初四日），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文獻編輯委員會，《宮中檔康熙朝朱批奏摺》第八輯，頁 810。

<sup>88</sup> 員外郎博什希等奏聞抵達噶爾丹所居之地事（康熙三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文獻編輯委員會，《宮中檔康熙朝朱批奏摺》第八輯，頁 767。「博什希」滿文作 bosih 而非 boših, 應譯作「博西希」，但漢文史料作「博世喜」，則 bosih 可能是 boših 之誤寫。

<sup>89</sup> 列納特二號圖；巴德利，《俄國·蒙古·中國》上卷，頁 429。

<sup>90</sup> 祁韻士等，《欽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卷八三，頁 594。

領有之眾，僅是南西伯利亞廣袤地域內的部分林中居民，並不包括克木克穆齊克以西，唐努山陰的部落。<sup>91</sup> 清朝史官作如此語，意在勾勒和托輝特概況，為下文敘述貴族世系張本，而非介紹「烏梁海」全貌，準噶爾領有的森林部落也就省略不提。既然如此，「烏梁海」能否涵蓋十七世紀末到十八世紀初，南西伯利亞的全體森林部落，還有待商榷，起碼該釐清「烏梁海」、「林國（森林部落）」、「吉爾吉斯」等族稱的涵義。

「吉爾吉斯」一詞，發軔於漢代漠北族羣「堅昆」與九世紀攻滅回鶻，橫行內亞的「黠戛斯」。俄語中 Киргиз / Киргизы 有泛指和確指之別。廣義上的 Киргиз / Киргизы 泛指吉爾吉斯、Казахи（哈薩克）、Хакасы（哈卡斯）等多個族群。巴托爾德辨析源流，認為該詞源於俄羅斯人對構成哈薩克主體的欽察人的稱呼，是對欽察語的誤讀，<sup>92</sup> 但筆者認為，這恰恰證明俄語 Киргиз / Киргизы 的語源來自毗鄰古羅斯的欽察部落，反映欽察人對「吉爾吉斯」的理解，借入俄語後，被俄羅斯人指代歐亞大陸上類似欽察人組織形態的族群。<sup>93</sup>

所謂確指用法，即 Киргиз / Киргизы 與真正的「吉爾吉斯」部落相對應，大概到十六世紀，俄國征服南西伯利亞，接觸到「吉爾吉斯」部落後才出現。十三世紀的蒙古史籍，稱南西伯利亞的森林部落民為「槐蔭亦爾堅」或「火因亦兒幹」，突厥語作 aghac-ari，aghac 一詞，乃「黠戛斯」之音轉，義為「林木中百姓」，指貝加爾湖至額爾齊斯河流域，操蒙古或突厥語的多個部落。<sup>94</sup> 《蒙古秘史》中，「吉爾吉斯」作「衆乞兒吉斯」，乃「槐蔭亦爾堅」中之著部，漢文恒作「乞兒吉思」。<sup>95</sup> 元朝於其地設「五部斷事官」，轄境涵蓋葉尼塞河流域，統

<sup>91</sup> 內閣學士眾佛保等奏報與策妄阿喇布坦議界摺（雍正三年正月初二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雍正朝滿文朱批奏摺全譯》上冊，頁 1011。

<sup>92</sup> Бартольд В. В. Киргизы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Сочинения. Т.2. Ч.1.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63, с. 493.

<sup>93</sup> 列夫申 (Алексея И. Левшин) 指出，十八世紀俄國人將哈薩克人稱為吉爾吉斯—哈薩克 (киргиз-казаки)，「哈薩克」是真正的族名，而「吉爾吉斯」是俄國人對哈薩克的修飾語。請參 Левшин А. И. Описание киргиз казачьих или киргиз-кайсацких, орд и степей. Алматы: Санат, 1996, с. 144.

<sup>94</sup> 周清澍，〈元朝對唐努烏梁海及其周圍地區的統治〉，氏著，《元蒙史札》（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1），頁 291；韓儒林，〈元代的吉利吉思及其鄰近諸部〉，氏著，《韓儒林文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頁 311。

<sup>95</sup> 札奇斯欽，《蒙古秘史新譯並注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9），頁 356。

稱「吉利吉思」，是以著部「乞兒吉思」作為區域之名。<sup>96</sup> 溯葉尼塞河而上之俄人亦借入蒙古語，以 Киргиз 指代葉尼塞河的吉爾吉斯部落。<sup>97</sup>

不過，在森林部落蝟集之區，很難分清泛指、確指的內涵與外延。巴托爾德稱，俄國人進入葉尼塞河流域時，有圖賓 (Тубинское)、耶澤爾 (Езерское)、阿爾泰 (Алтырское)、阿爾泰薩爾 (Алтысарское) 四個吉爾吉斯汗國。<sup>98</sup> 「圖賓」出自七世紀鐵勒部落之「都波」，亦即「圖瓦」，乃唐努烏梁海之民，<sup>99</sup> 而「阿爾泰」與「阿爾泰薩爾」疑為源自阿爾泰山的部落，所以這四個「吉爾吉斯汗國」仍為泛指。另如康熙六年僧格擊垮阿勒坦汗羅卜藏額琳沁，奪取和托輝特領有之森林部落的貢賦權，成為吉爾吉斯之主。僧格死後，他們又屈服於噶爾丹。<sup>100</sup> 俄國人遂將葉尼塞河以南，直抵阿爾泰山盡頭的林中部落泛稱為 Киргиз。譬如策妄阿喇布坦與眾佛保談判時，將舊居科布多的明阿特人視為己之部曲，而俄人呼為吉爾吉斯。<sup>101</sup>

моо гурун，即「林國」，是噶爾丹對森林部落稱呼的滿文轉譯，舊譯「茂明安」實誤。<sup>102</sup> 「烏梁海」即「兀良哈」，是蒙古人對「林中之人」的稱謂，滿洲則沿襲之。清朝佔領準噶爾後，將烏梁海分為唐努、阿勒坦淖爾和阿爾泰三部，族群構成複雜。以阿勒坦淖爾烏梁海為例，烏曼斯基 (А. П. Уманский) 認為，十七世紀，阿爾泰山分佈的主要族群是 Телеут，十七世紀的俄文檔案寫作 Телегут。<sup>103</sup> 部分譯者受現代俄語影響，譯為「捷列古特」。其實 те 應讀為 [t'ε]

<sup>96</sup> 韓儒林，〈元代的吉利吉思及其鄰近諸部〉，頁 322-324。

<sup>97</sup> 除 Киргиз / Киргизы 之外，俄人亦以源於「點曼斯」的 Хакас / Хакасы (哈卡斯) 代稱葉尼塞吉爾吉斯等森林部落。至於二者的異同，礙於篇幅所限，將另作文討論。請參 Лебина М. Г. и Потапова Л. П. *Народы сибиря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56, с. 376-380.

<sup>98</sup> Бартольд В. В. *История Турецко Монгольских Народов. Сочинения. Т.5*.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68, с. 217.

<sup>99</sup> 周清澍，〈元朝對唐努烏梁海及其周圍地區的統治〉，頁 148。

<sup>100</sup> Бартольд В. В. *История Турецко Монгольских Народов*. с. 218.

<sup>101</sup> 內閣學士眾佛保等奏報與策妄阿喇布坦議界摺 (雍正三年正月初二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雍正朝滿文朱批奏摺全譯》上冊，頁 1012；Слесарчук Г. И. *Русско-мого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685-1691*. № 102, с. 269.

<sup>102</sup> 噶爾丹書稿 (康熙三十五年)，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文獻編輯委員會，《宮中檔康熙朝朱批奏摺》第八輯，頁 546, 588。誤譯參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譯，《康熙朝滿文朱批奏摺全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頁 132。

<sup>103</sup> Уманский А. П. *Телеуты и русские в XVII — XVIII вв.*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Наука, 1980, с. 5-7.

而非 [tʃɛ]，音譯「帖列古特」。滿文作 *telenggut*，直譯為「特楞古忒」，通常滿語濁鼻音 [ŋ] 與清塞音 [k] 連讀，後者被弱化，亦可譯為「特楞烏忒」，與俄語 Телеут 切近。馮承鈞校訂《史集》，指波斯文 *telengut* 源於突厥語 *Täläugut*，即《蒙古秘史》所載「帖良古惕」，在兔兒年（金泰和七年，1207）朮赤討伐「林木中百姓」時自為一支。<sup>104</sup> 前述「白卡爾梅克」亦指該部，可見他們頗類衛拉特人（卡爾梅克人）。

十八世紀初，策妄阿喇布坦治下特楞古忒部落分佈於阿勒坦淖爾一帶，部分以農耕為生。<sup>105</sup> 康熙五十九年，清軍掃蕩阿爾泰山西麓準噶爾牧場，擄獲人眾內就有特楞古忒人。起初，清朝將俘虜概視為烏梁海，允許丹津阿喇布坦之子車凌旺布、和托輝特貝勒博貝屬下烏梁海人兄弟團聚，而車凌旺布屬下烏梁海人「與策妄阿拉布坦所屬之居於阿勒坦諾爾之特楞古忒人互為親戚」，<sup>106</sup> 反映森林部落錯綜複雜的關係。後經甄別，有三百零五名特楞古忒人東遷齊齊哈爾，成為今日黑龍江柯爾克孜（吉爾吉斯）族的一部分。<sup>107</sup>

由此可見，阿勒坦淖爾烏梁海的主要族群是特楞古忒，則「烏梁海」實為森林部落之泛稱，應無異議。不過，至遲到十八世紀三十年代，「烏梁海」已不包括吉爾吉斯。雍正十一年（1733）丹津阿喇布坦之子色布騰旺布請將其領有的百餘戶吉爾吉斯人內遷，理由是「我所屬之吉爾吉斯之眾，兄弟、親戚多半俱在噶爾丹策零處，此輩素懷貳心」（*mini harangga kirgis ursei ahün deo niyaman hūcihin labdu dulin gemu g'aldan cering i bade bisire jakade ese daci encu gūnin jafafi*），<sup>108</sup> 擔心禍起蕭牆，故將他們從「烏梁海」中剔除。那麼，本在葉尼塞河居住的吉爾

<sup>104</sup> 馮承鈞、陸峻嶺，《西域地名》（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94。

<sup>105</sup> 副將軍丹津多爾濟等奏報宣諭各烏梁海招降羅卜藏舒努情形摺（雍正六年二月初六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雍正朝滿文朱批奏摺全譯》下冊，頁1605。

<sup>106</sup> 議政大臣弘昇等奏（康熙五十九年八月十七日），「宮中康熙朝滿文朱批奏摺」（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副將軍丹津多爾濟等奏報宣諭各烏梁海招降羅卜藏舒努情形摺（雍正六年二月初六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雍正朝滿文朱批奏摺全譯》下冊，頁1605。

<sup>107</sup> 烏雲畢爾紮拉，〈清朝邊疆政策——以唐努烏梁海納入清朝版圖及特楞古特、塔本、科勒薩哈勒、柯爾克孜等移住黑龍江為中心〉，烏雲畢力格主編，《滿文檔案與清代邊疆民族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頁273。

<sup>108</sup> 靖邊大將軍、順承親王錫保等奏（雍正十一年三月十六日），「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03-1480-1，038-758。清朝將這批吉爾吉斯人遷往黑龍江，編入八旗組織，參吳元豐，〈柯爾克孜族東遷黑龍江地區考實〉，《黑龍江民族叢刊》2001.1：69-74。

張建

吉斯部落為何會遷往準噶爾？這要從策妄阿喇布坦發起的，內亞史上著名的大遷徙談起。

一七〇三年（康熙四十二年），韃靼人（Татары）向俄國報告：

譯文：約二千五百卡爾梅克人來到吉爾吉斯人的土地，把吉爾吉斯人全部遷走，現在吉爾吉斯土地上已空無一人。<sup>109</sup>

吉爾吉斯部落的去向，據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逃亡俄國的和通（Хотон）稱：

譯文：他們說，五十多年前，現在的琿台吉噶爾丹策零（Галдан-Черена）同三位卡爾梅克宰桑杜噶爾（Дунар）、散濟（Сандык）、祁畢里（Чинбыль）各率五百人襲掠他們的牧地，未經戰鬥，強迫包括他們在內的三千戶，連同先汗塔能巴特爾台吉之子察內什（Чайнышем）前往準噶爾土地上的烏爾噶（Урга），他們在那裡生活至今，向噶爾丹策零納貢。<sup>110</sup>

杜噶爾、散濟都是準噶爾赫赫有名的宰桑，獨祁畢里不彰於世。<sup>111</sup> Урга 即琿台吉居處。可見，策妄阿喇布坦長子噶爾丹策零指揮了本次行動，將多達三千戶的葉尼塞吉爾吉斯部落西遷，歸其領有，游牧於大帳附近。巴托爾德談到，吉爾吉斯部落西遷後的安置地點，並不清楚。<sup>112</sup> 和通將此地呼為 Шарабе，究屬何地，須援滿、漢文檔案考證。

雍正用兵西北，準噶爾治下各部落民屢有投清者。筆者蒐得三份逃來清營，昔年被迫西遷的烏梁海人口供，備述遷徙秘辛。一是雍正九年，烏梁海人廓西格（kuwesige）逃往克穆齊克，述其身世：

mini gebu kuwesige. mini ama. mafa daci kalkai noyan sei harangga seme. mini ajigen de mini ama gisurere be donjiha bihe. ya noyan i niyalma bihe be ejeme muterakū. mini ama be ts'ewang rabtan de tabcilabufi emu tanggū dehi boigon i uriyanghai i sasa gaifi. han hatun de tehe uriyanghai i emu bade tebuhe. tubade

<sup>109</sup> Бартольд В. В. История Турецко Монгольских Народов. с. 218-219.

<sup>110</sup> Валиханов Ч. Ч. Киргизское Родословие.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6, с. 285.

<sup>111</sup> 康熙五十九年，深入準噶爾清軍後撤時，散濟（sangji）隨噶爾丹策零追擊，為清軍所敗。杜噶爾（dugar，一作都噶爾）姓喀喇沁，與其子查袞（cagun）多次同清軍作戰。二人與噶爾丹策零關係密切。頒賜策妄阿喇布坦敕諭（康熙五十九年十月十七日），「內閣蒙古堂檔」，康熙五十七至六十年策妄阿喇布坦敕諭檔；靖邊大將軍傅爾丹奏（雍正九年六月十四日），「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03-1107-4，024-1067。

<sup>112</sup> Бартольд В. В. Киргизы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с. 526.

mimbe banjha amala. geli guibufi ili birai cala alimatu sirabel de tebuhe.

譯文：我叫廓西格。我的父、祖本為喀爾喀諾顏所屬，我小時候曾聽我父親說過，記不清是哪個諾顏。我父親被策妄阿喇布坦劫走，同一百四十戶烏梁海被帶走，與汗哈屯的烏梁海住在一起，我在那兒出生後，又遷至伊里河西南的阿里瑪圖、西拉伯勒地方住居。<sup>113</sup>

二是逃奔吐魯番的烏梁海人鄂倫 (urum) 的兩份口供，分屬十年 (1732) 二月與十一月，各為漢、滿文。蓋因本年以旗人查郎阿 (jalangga) 入替岳鍾琪為西路大帥，重複提審所致。其一曰：

我原係烏梁海家的人，當年曾與天朝當差，我是奇慶宰桑。後來，阿喇布坦將我們人眾撤往沙拉伯里，……至今有三十年了。<sup>114</sup>

其二稱：

bi konggor ba i uriyanghai. mini jui i gebu kara. meni ama. jui juwe nofi dahame jihe. g'aldan cering. mimbe gidame jafafi. kirgis i jaisang danjin de jušen obume bure jakade. meni ama jui umesi korsofi. niyalma i jušen ofi yabure anggala.

譯文：我是洪郭爾地方的烏梁海，我兒子名叫喀喇。我們父子倆來投，蓋因噶爾丹策零壓制我，給吉爾吉斯宰桑丹津為屬民。我父子極為憤恨，豈有給人做屬民之理？<sup>115</sup>

廓西格、鄂倫祖輩本是和托輝特貴族領有的烏梁海。廓西格被準噶爾先遷往「汗哈屯」(han hatun)，復遷往伊里河旁的「阿里瑪圖」(alimatu) 與「西拉伯勒」(sirabel)，鄂倫亦被遷往「沙拉伯里」，須考其地望。何秋濤證「汗哈屯」曰：

阿爾泰為漠北最高之山，亦稱「汗山」。所出之河，以「哈屯」名，故烏梁海人亦稱「汗哈屯烏梁海」，以所居之山川為號也，亦稱「汗烏梁海」，專以山目之也。<sup>116</sup>

<sup>113</sup> 靖邊大將軍傅爾丹奏（雍正九年六月十四日），「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03-1107-4，024-1067。

<sup>114</sup> 寧遠大將軍岳鍾琪等奏報彝人鄂倫及子哈喇投誠供出情由摺（雍正十年二月二十六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摺彙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第21冊，頁934。

<sup>115</sup> 署寧遠大將軍查郎阿奏（雍正十年十一月），「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03-1134-7，025-0896。

<sup>116</sup> 何秋濤，《朔方備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史部第741冊），卷二六，頁408。

張建

何氏釋「汗哈屯」之「汗」為「汗山」，且目阿爾泰山為「汗山」，實謬。雍正六年（1728），清朝從烏梁海人處得知，從克穆河到汗山，需西行十七日，「其四面各有十四日路程，皆稱為汗地」，<sup>117</sup> 可知「汗山」為阿爾泰羣山之一。「汗」義出「汗山」，引申「汗地」，指代周邊地區。「哈屯」即《一統志》載科布多輿圖內的「哈屯河」，列納特二號圖標注為 Хатунь / Khatun，即今俄羅斯境內的 река Катунь（卡童河），<sup>118</sup> 是鄂畢河源頭之一。

乾隆二十四年（1759），底定準噶爾後，汗山之東盡入版圖。次年，烏梁海總管車根（cegen）稱「汗喀屯原係烏梁海之地，與俄羅斯無涉」（han katun daci uriyanghai i ba. oros de dalji akū.），<sup>119</sup> 「汗喀屯」即「汗哈屯」，屬大清疆土。乾隆五十五年，諭將汗山、察罕烏蘇（cagan usu）、歸阪色畢（goiban sebi）等處詳查繪圖。<sup>120</sup> 此圖現存北京故宮，以紅圈點標出「汗哈屯」四至，是自 oimon gool（即何秋濤所云鄂依滿河）向西北，西至汗山、察罕烏蘇、歸阪色畢，東抵距鄂依滿河九日路程的哈克淖爾卡倫（hak noor karun），東北與阿勒坦淖爾烏梁海交界，囊括哈屯河兩岸的廣袤地區。正中黃簽清書「han alin cagan usu goiban sebi i julergi ergide ne oros i uriyanghai sa nukteme tehebi」（汗山、察罕烏蘇、歸阪色畢之南，現已有俄羅斯烏梁海游牧住居）。<sup>121</sup> 俄屬烏梁海紛紛越界游牧，遂開日後西北邊界起釁之端。

「阿里瑪圖」之地望，滿文作 ili birai cala，即「伊里河那邊」。《一統志》伊犁部分提到兩個阿里瑪圖，一處「在伊犁北一百里」，此處的「伊犁」指坐落烏哈爾里克河濱的惠遠城。《西域圖志》詳記其地望云：

阿里瑪圖，在伊犁郭勒北，察罕烏蘇之西，南距伊犁一百里。阿里瑪圖郭勒經流其地。<sup>122</sup>

「伊犁郭勒」即「伊里河」。「察罕烏蘇」，翁科夫斯基地圖作 Цаган усу，漢義

<sup>117</sup> 副將軍丹津多爾濟等奏報宣諭各烏梁海招降羅卜藏舒努情形摺（雍正六年二月初六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雍正朝滿文朱批奏摺全譯》下冊，頁1605。

<sup>118</sup> 列納特二號圖；巴德利，《俄國·蒙古·中國》上卷，頁430。

<sup>119</sup> 軍機處奏片（乾隆二十五年十月），「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03-1846-29，058-0729。

<sup>120</sup> 大學士阿桂等字寄（乾隆五十五年十月初九日），「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03-3300-21，148-3319。

<sup>121</sup> 佛珠、薩穆丕勒多爾濟等繪汗哈屯輿圖（乾隆五十六年本，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sup>122</sup> 傅恒等，《欽定皇輿西域圖志》卷一二，頁21b。

「白水」，注入伊里河。<sup>123</sup> 列納特一號圖將其西面的一條小河，標注為 Алимуту / Alimutu (阿里木圖)，即「阿里瑪圖郭勒」。<sup>124</sup> 惠遠城北的阿里瑪圖就位於這條河旁。

另一處名為「古爾班阿里瑪圖」，位於「庫爾圖」東，「庫爾圖」即列納特一號圖中的 Көтөнъ Күртү / Kötön Kurtu，是北向注入伊里河的河流。它東側的河流，標有 Алимуту / Alimutu (阿里木圖)，此河在漢籍中稱為「古爾班阿里瑪圖」，它與塔拉噶爾河兩間之地，因河得名「古爾班阿里瑪圖」，即今之阿拉木圖 (Алма-Ата)。<sup>125</sup>

雍正九年六月，逃往清營的布魯特人稱，哈薩克襲擊吹河、塔拉斯河流域的準噶爾部落，掠去千戶人家。<sup>126</sup> 同月，清軍擊獲準噶爾人塔蘇爾海丹巴 (tasurhai damba) 稱，噶爾丹策零為防備哈薩克，動員萬兵，駐阿里瑪圖、西拉伯勒。<sup>127</sup> 所以，阿里瑪圖、西拉伯勒必去吹河、塔拉斯河不遠。廓西格提到的阿里瑪圖，實即「古爾班阿里瑪圖」。

「西拉伯勒」，滿文作 sirabel。《高宗純皇帝實錄》載，準噶爾故地，有名 šarabel 者，漢譯「沙喇伯勒」，位於阿勒坦額默勒嶺、庫隴癸嶺外，可抵哈薩克。<sup>128</sup> 乾隆二十三年 (1758)，富德奏報「奴才我自塔拉斯 (河)、吹 (河) 直抵沙喇伯勒」(aha bi talas cui ci šarabel de isitala)。<sup>129</sup> 此處地接兩河，必為常與阿里瑪圖並稱之「西拉伯勒」。徐松謂其切近特穆爾圖淖爾 (今伊塞克湖)，查乾隆三十二年阿桂奏摺，有令伊犁參贊大臣伊勒圖 (iletu) 「至沙喇伯勒、特穆爾圖

<sup>123</sup> Веселовский Н. И. Посольство к зюнгарскому Хунтайджи Цэван Рабгану капитана от артиллерии Ивана Унковского и путевой журнал его на 1722-1724. К1.

<sup>124</sup> 列納特一號圖 (烏普薩拉：烏普薩拉大學圖書館藏)；巴德利，《俄國·蒙古·中國》上卷，頁 387；傅恆等，《欽定皇輿西域圖志》卷二六，頁 7a。

<sup>125</sup> 列納特一號圖；巴德利，《俄國·蒙古·中國》上卷，頁 384；傅恆等，《欽定皇輿西域圖志》卷一三，頁 3b-4a。

<sup>126</sup> 寧遠大將軍岳鍾琪奏報詢問準噶爾投誠之兩名回民情由摺 (雍正九年六月二十四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摺彙編》第 20 冊，頁 793。

<sup>127</sup> 靖遠大將軍傅爾丹等奏 (雍正九年六月十八日)，「軍機處滿文月摺檔簿」。塔蘇爾海丹巴被擒經過與部分口供，參見張建，〈和通泊之役與大清國的邊務危機〉，頁 450-452。

<sup>128</sup> 慶桂等纂，《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 (滿文本)》 (嘉慶十二年 [1807] 大紅綾本，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卷五一二，乾隆二十一年五月辛未，頁 16a。

<sup>129</sup> 參贊大臣富德奏 (乾隆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03-1721-30，50-1961。

張建

淖爾等處巡查」(šarabel temurtu noor i jergi bade isibume giyarime baicanaki) 之語，<sup>130</sup> 可證徐氏之言不虛。

至於「沙拉伯里」，應係「沙喇伯勒」音轉。蒙語輔音字母 l 是邊擦音 [ɮ]，而滿文字母 l 是舌尖前邊音 [l]，原本兩歧，譯漢遂有參差。俄語 Шарабе 實為前置格變化，原形應是 Шараб，音譯「沙喇伯」，蓋因語彙借入時，輔音詞尾脫落所致。

沙喇伯勒去博羅塔拉較遠，和通卻稱其在大帳左近。這是因為大帳常年移牧，翁科夫斯基出使期間，曾隨大帳沿伊里河游牧。康熙五十四年 (1715)，準噶爾俘虜滿濟 (manji) 云，策妄阿喇布坦常居六地，包括西拉伯勒 (sira bel)。<sup>131</sup> 所以，伊里河畔，水草豐美的沙喇伯勒確為策妄阿喇布坦駐牧之所。

總之，Шарабе、sirabel (sira bel)、šarabel、「沙拉伯里」本係一地，應在阿里木圖河東，車里克河或察林河西，西接吹、塔拉斯河流域，南通特穆爾圖淖爾，可同時警備哈薩克、布魯特，是伊里的西南門戶。

廓西格、鄂倫自稱「烏梁海」，廓西格原居地不詳。鄂倫原居洪郭爾，即前述「洪郭壘」，聲稱不甘受吉爾吉斯貴族管轄，並非同類。看來，準噶爾裹挾的「吉爾吉斯」包括散居葉尼塞河谷地的多個森林部落。他們被遷往伊里河南的沙喇伯勒，其中一部分人先西遷汗哈屯，再南徙沙喇伯勒。那麼，策妄阿喇布坦遷移這些「林木中百姓」的真意何在？

茲拉特金認為策妄阿喇布坦此舉是為避免與溯葉尼塞河而上的俄國殖民者，因爭奪森林部落民的貢賦權發生衝突。<sup>132</sup> 此說固然不假，但僅從沙俄與準噶爾的關係就事論事，忽略了十八世紀初中亞各勢力間的博弈，並不全面。

如前所述，僧格擊敗阿勒坦汗，獲得了葉尼塞森林部落民的徵稅權。噶爾丹時代，丹津阿喇布坦掌握著眾多烏梁海部落。康熙三十六年，他奏稱「惟我之屬下烏梁海之眾難於遷移」(damu mini fejergi uranghai urse gurire de mangga)，分佈在地處葉尼塞河流域的洪郭壘等處。<sup>133</sup> 鑒於烏梁海部落「世世代代在樹中捕獵為

<sup>130</sup> 伊犁將軍阿桂等奏（乾隆三十二年八月初五日），「軍機處滿文月摺檔簿」；徐松，《西域水道記》（收入徐崇立輯，《西域輿地三種匯刻》〔光緒三十二年（1906）刻本〕），卷四，頁 40b。

<sup>131</sup> 厄魯特滿濟口供（康熙五十四年五月十九日），「宮中康熙朝滿文朱批奏摺」。

<sup>132</sup> 茲拉特金，《準噶爾汗國史（1635-1758）》，頁 319。

<sup>133</sup> 筆帖式黑色、王府長史馬尼圖等奏聞出使阿喇卜坦情形（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初四日），《宮中檔康熙朝朱批奏摺》第八輯，頁 813。

生。若誰強大，即被佔領，為彼納貢」，<sup>134</sup> 廓西格、鄂倫祖輩實歸其統馭。噶爾丹死後，阿喇布坦仍盤桓阿爾泰山迤東，與策妄阿喇布坦相抗，直到康熙四十一年（1702）始南下歸清。策妄阿喇布坦遂乘虛而入，強迫「林木中百姓」移徙。

噶爾丹全盛時，哈薩克、布魯特皆為之所敗。策妄阿喇布坦起兵後，軍力單弱，哈薩克、布魯特交相反撲。康熙三十九年，上諭「策旺拉卜灘素行奸惡，故其附近哈薩克、布立敦諸國，皆相仇讐」。<sup>135</sup>「布立敦」，《實錄》作「布魯特」，<sup>136</sup> 即游牧於天山南路和特穆爾圖淖爾一帶，信奉伊斯蘭教的吉爾吉斯一乞卜察克部落，與信奉原始宗教和藏傳佛教的葉尼塞吉爾吉斯部落並不相同。

十七世紀末至十八世紀初，準噶爾與布魯特激烈爭奪喀什噶爾與葉爾羌的控制權。《和卓傳》稱，達涅爾和卓返回喀什噶爾時，此地的實際統治者是吉爾吉斯人，他們不停侵掠葉爾羌。<sup>137</sup> 當時操縱喀什噶爾局勢的阿爾祖·穆罕默德（Арзу Мухаммад）伯克統合了吉爾吉斯一乞卜察克部落，一度佔據葉爾羌。<sup>138</sup> 檔案記載：

neneme burut be ardz'a mamut sere bek dalafi. yerkin. hasigar be durime gaifi mujakū etuhun yabuha. ts'ewang rabtan inu embe umainame muterakū bihe. amala ardz'a mamut bucere jakade. ts'ewang rabtan yerkin. hasigar be dasame gaiha.

譯文：先是，布魯特由名為阿爾紮·瑪穆特伯克統領時，奪佔葉爾羌、喀什噶爾，甚為強橫，策妄阿喇布坦亦無如之何。後因阿爾紮·瑪穆特亡故，策妄阿喇布坦才得統治葉爾羌、喀什噶爾。<sup>139</sup>

進摺人拉錫（rasi）曾在康、雍兩朝多次出使準噶爾，熟悉當地風土掌故。阿爾紮·瑪穆特即阿爾祖·穆罕默德。可見，策妄阿喇布坦未能像奪取吐魯番那樣輕易佔領喀什噶爾、葉爾羌，是受布魯特人阻礙。直到康熙三十九年（1700）之

<sup>134</sup> 副將軍策凌等奏報招集烏梁海人防範策妄阿拉布坦摺（雍正四年八月十四日），《雍正朝滿文朱批奏摺全譯》下冊，頁1396。

<sup>135</sup> 《清代起居註冊·康熙朝》（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第15冊，康熙三十九年七月初九，頁8086。

<sup>136</sup> 馬齊等，《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卷二〇〇，康熙三十九年七月庚子，頁34。

<sup>137</sup> Muhammad S. Kashgari, "The History of the Khojas of Eastern Turkistan," trans. Robert B. Shaw, *the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66.1 (1897): 31.

<sup>138</sup> Ромодин В. А.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киргизов и Киргизии. В.1.*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73, с. 223.

<sup>139</sup> 領侍衛內大臣拉錫奏（雍正十年九月二十一日），「軍機處滿文月摺檔簿」。

張建

後，準噶爾才控制葉爾羌。<sup>140</sup> 為削弱布魯特部落，策妄阿喇布坦趁其群龍無首，將為首的兩、三千戶遷往伊里，復將葉尼塞吉爾吉斯等森林部落民置於特穆爾圖淖爾以北的沙喇伯勒，鉗制布魯特人。

所以，遷徙葉尼塞河森林部落民是在丹津阿喇布坦投清，東進障礙消除後進行的。此舉的目的，一是使這些部落從納貢者轉變為準噶爾汗國的屬民，充實力量，二是避免他們成為俄國臣民，日後因貢賦權問題釀成衝突，三是令其拱衛伊里西南門戶，防備穆斯林游牧民，尤其是新征服的布魯特人反抗。

總而言之，策妄阿喇布坦更注重收集人丁，而非一味奪取牧地。他在康熙三十年突襲科布多，掠取噶爾丹的屬人後就撤退了。至於唐努山南北，包括烏蘭固木、烏布蘇淖爾、克穆齊克河流域的牧場，他在康熙三十六年之前也未曾統治過。直到康熙四十一年，丹津阿喇布坦南下後，他才深入葉尼塞河流域，將吉爾吉斯等部落民遷至沙喇伯勒，脅制布魯特。

至於策妄阿喇布坦向清使宣稱盡收噶爾丹牧地，實別有深意。因為雍正上臺後，計議與準噶爾劃清邊界。清朝主張以阿爾泰山劃界，策妄阿喇布坦則要求將科布多河西至唐努山陰，包括克木克穆齊克烏梁海之地都劃歸準噶爾，故而編造了「全收噶爾丹游牧地」的大言蒙蔽清使，以期佔據主動，不過是虛張聲勢的談判伎倆罷了。

## 結論：策妄阿喇布坦的崛起與準噶爾的再興

十五至十八世紀，亞洲大陸上崛起多個由游牧、半游牧族群締造的帝國或強權，前者如塞爾柱突厥建立的鄂圖曼 (Ottoman)、河中突厥南下創立的大清，後者如月即別部落統合而成的昔班尼 (Шейбани / shaybani)、噶爾丹光大勃興的衛拉特。<sup>141</sup> 帝國與強權錯綜複雜的鬥爭，決定著亞洲歷史的走向。

---

<sup>140</sup> 劉正寅，〈策妄阿喇布坦對天山南路的征服與統治〉，《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4.2：38-45。

<sup>141</sup> Marshall G. S. Hodgson, *The Venture of Islam: conscience and history in a world civilization*, vol. 3, *The gunpowder empires and modern tim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4, p. 18; Иванов П. П.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Москва: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8, с. 46-57.

噶爾丹一統衛拉特，征服哈薩克、烏茲別克、葉爾羌、喀爾喀諸汗後，與遠東最強帝國大清的角力，可視為中亞—東亞政治力量的對抗，牽涉到半個亞洲的命運，而策妄阿喇布坦的崛起堪稱打破均衡的勝負手，噶爾丹自此滿盤落索。

十八世紀初，清朝與準噶爾交惡之際，清朝君臣竭力貶低策妄阿喇布坦的形象，抹殺他的崛起對噶爾丹覆亡的意義。康熙五十九年，諭：

neneme si g'aldan ci ukame jailafi eren habirgan i bade emu udu niyalma be gaifi umesi suilashun forgon ci dahū jargūci be takūrafi gosime tuwašataha. amala g'aldan i fejergi urse. simbe baime genehengge be leheme gaihakū. sinde bibufi. suweni jun gar be taksibuha. tere fonde dorgi tulergi uheri gemu ts'ewang rabtan be bibuci. ere hala daci akdaci ojorakū. atangi bicibe ekisaka banjirakū sehede. bi šajin ergengge. geren boo be gosime emhun geren i baru jun gar emu aiman be dahame. bikini seme ilibuha. tere fonde si umesi gocishun ginggun bihe.

譯文：先是，爾逃避噶爾丹，帶少數人在額琳哈畢爾噶處，甚為困窘。自那時起，遣達虎札爾固齊恩賜關照。後噶爾丹屬下投奔爾者，不再追索，容爾收留，將爾之準噶爾保全。彼時內外俱稱若留策妄阿喇布坦，此姓素不可信，終不寧謐。朕軫念佛門眾生，向眾人稱，準噶爾既為一部落，令其保留，遂止之。那時爾曾甚為謙恭。<sup>142</sup>

上諭將策妄阿喇布坦的崛起歸於大汗「仁育覆載」，恩養扶植的結果。話中暗寓褒貶，刺其為背叔逃亡、搖尾乞憐、忘恩負義之輩。這種居於正統，標榜仁厚寬容，獨斷歷史解釋權之舉，是康熙帝慣用的手法。<sup>143</sup> 設若今人僅從清朝史料出發，研究準噶爾史，難免墮入清人設計的陷阱，視策妄阿喇布坦如一介小丑，他的起兵無足輕重。

本文綜合多方文獻證明：策妄阿喇布坦因遊獵而眇一目，漁色以致梅毒纏身，實在不符合中原「內聖外王」的仁君英主形象，但他少年失怙，卻不甘寄人籬下。起兵後席捲準噶爾故地與吐魯番，又趁噶爾丹未歸，一度攻陷科布多，憑一己之力重振準噶爾，才幹非常人可及。

<sup>142</sup> 頒賜策妄阿喇布坦敕諭（康熙五十九年十月十七日），「內閣蒙古堂檔」，康熙五十七至六十年策妄阿喇布坦敕諭檔。

<sup>143</sup> 姚念慈，〈再評「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面諭》、歷代帝王廟與玄燁的道學心訣〉，《清史論叢》2009：108-186。

誠然，清朝傾天下之資，並力西北，必欲殄滅噶爾丹而後已，使之無暇西顧，減輕了策妄阿喇布坦的壓力。可是，策妄阿喇布坦的出走，以及與阿努喀屯的聯合，令四衛拉特離心離德，各為其主，也使清朝受益。尤其是他洗劫科布多，迫使噶爾丹遠赴克穆齊克河尋求補給，使之業已脆弱不堪的軍力雪上加霜。要之，噶爾丹的宏願是被滿洲人和他的衛拉特子侄共同摧毀，可謂歷史的吊詭。

準噶爾汗國在噶爾丹的事業土崩瓦解之際，竟逃過被清朝吞併的命運，頑強地生存下來，與策妄阿喇布坦的自立密不可分。正因為他與噶爾丹相頡頏，使準噶爾本部與噶爾丹勢力剝離開來，擁有與清朝繼續博弈的資本。策妄阿喇布坦治下的準噶爾，不是單純的四衛拉特聯盟，而是混和內亞多種族群之國。哲布尊丹巴致策妄阿喇布坦書對這時的準噶爾有十分精當的評價：

neneme si mini elcin cuyang tojin de alaha gisun. mini ūlet alha morin i funiyehe gese sehebi. unenggi baita bici. ese sinde geli emu gūnin i yabumbio.

譯文：昔日爾謂我使者楚陽托津曰：我厄魯特猶如花馬之毛，等語。誠有變故，此等人安能與爾同心而行？<sup>144</sup>

策妄阿喇布坦自嘲厄魯特（衛拉特）如同「花馬之毛」，蓋言其部落叢雜，誠屬展露心跡。他起兵之際，正值蒙古局勢風雲激蕩的年代。清朝挾討伐噶爾丹之威，將七旗喀爾喀與庫庫淖爾和碩特盡入版圖。噶爾丹死後，麾下的百戰精銳亦多南歸。大清聲威，震動內亞。他收拾噶爾丹霸業的廢墟餘燼，東拆西補，竟能保有一方諸侯之局，極其不易。搜羅人丁，維持準噶爾於不墜，是其首要急務。

若松寬將康熙四十至四十三年（1701-1704），準噶爾兼併土爾扈特萬人，視為策妄阿喇布坦崛起史結束的標誌。<sup>145</sup> 其實，準噶爾汗國振衰起弊，決非僅靠搜集四衛拉特人丁，徙葉尼塞吉爾吉斯等森林部落、布魯特部落於伊里河流域，也在這一時期。策妄阿喇布坦將來自不同地域的游牧、獵貂族群變為準噶爾的屬民，彌補衛拉特人丁不足的缺陷，服務於對外擴張的事業。

經策妄阿喇布坦多年經營，準噶爾的大纛下聚集著來自內陸亞洲各族群的戰士，再度勃興為雄踞中亞的強權。他和子孫憑藉這份基業，與清朝抗衡四十餘年（1715-1759），阻遏了俄國向南西伯利亞擴張的步伐，成為抗擊中亞伊斯蘭化的橋

<sup>144</sup> 哲布尊丹巴致策妄阿喇布坦書稿（無年月），「宮中康熙朝滿文朱批奏摺」。此書實為康熙授意議政大臣以哲布尊丹巴之名撰寫，但策妄阿喇布坦之言應屬實。白新良，〈已刊康熙朝滿漢文奏摺證誤〉，氏著，《清史考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頁313。

<sup>145</sup> 若松寬，〈ツェワン・アラブタンの登場〉，頁74。

頭堡。中亞最後一位偉大的征服者納迪爾沙赫 (Nādir Shāh) 畢生夙願，就是發動東征準噶爾的「聖戰」。<sup>146</sup> 準噶爾的聲威，不問可知。

然而，如哲布尊丹巴所言，族群複雜、政出多門的體制，是汗國的隱憂。策妄阿喇布坦在時，尚能約束部眾。他撒手人寰後，清朝討伐準噶爾，各部落民屢有赴清營請降，甚至逃入俄羅斯者。乾隆二十年 (1755)，由布魯特、天山南路居民組成的「包沁」(boocin) 響應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的號召降清，<sup>147</sup> 為清朝打開了通往中亞的大門。準噶爾覆亡的種子，在策妄阿喇布坦再造汗國時便已植下。

(本文於民國一〇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收稿；一〇三年八月二十一日通過刊登)

## 後記

感謝兩位匿名評審人面面俱到、切中肯綮的審查意見，令拙稿增色不少。小文寫作期間，早稻田大學的柳澤明、蒙古勒乎、北京故宮博物院朱賽虹、中國人民大學關康、北京大學孔源、政治大學許富翔等多位師友或提出寶貴建議，或示以罕見資料。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利用部為筆者查閱檔案提供諸多便利。謹致謝忱！惟文中疏謬，概由筆者負責。

---

<sup>146</sup> Chahryar Adel and Irfan Habib,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Turin: Ages Arti Grafiche, 2003), vol. 5, p. 264.

<sup>147</sup> 「包沁」是由天山南路各城、布魯特人組成的專操火器之軍，參見羽田明，《中央アジア史研究》(京都：臨川書店，1982)，頁 285-286；佐口透，《ロシアとアジア草原》(東京：吉川弘文館，1966)，頁 156-158。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內閣蒙古堂檔」，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 「軍機處滿文月摺檔簿」，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 「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 「軍機處漢文錄副奏摺」，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 「宮中康熙朝滿文朱批奏摺」，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 《清代起居註冊·康熙朝》，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摺彙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譯，《康熙朝滿文朱批奏摺全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譯，《雍正朝滿文朱批奏摺全譯》，合肥：黃山書社，1998。
- 札奇斯欽，《蒙古秘史新譯並注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9。
- 列納特一、二號圖，烏普薩拉：烏普薩拉大學 (Uppsala Universitet) 圖書館藏。
- 何秋濤，《朔方備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史部第741冊。
- 佛珠、薩穆丕勒多爾濟等繪汗哈屯輿圖，乾隆五十六年本，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 帕拉斯 (Peter S. Pallas) 著，邵建東、劉迎勝譯，《內陸亞洲厄魯特歷史資料》，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
- 祁韻士等纂，《欽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第454冊。
- 阿旺洛桑嘉措著，陳慶英、馬連龍、馬林譯，《五世達賴喇嘛傳》，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7。
- 徐松，《西域水道記》，收入徐崇立輯，《西域輿地三種匯刻》，光緒三十二年(1906)刻本。
- 馬齊等纂，《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 庫羅帕特金 (Алексей Н. Куропаткин) 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譯，《喀什噶爾》，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 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宮中檔康熙朝朱批奏摺》，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7，第八輯。

- 傅恒等纂，《欽定平定準噶爾方略》，乾隆三十七年（1772）刻本，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 傅恒等纂，《欽定皇輿西域圖志》，乾隆四十七年（1782）武英殿本，北京：北京圖書館藏。
- 喇德納巴德喇著，成崇德譯，《咱雅班第達傳——月光》，北京：全國圖書館縮微文獻複製中心，1990。
- 溫達等纂，《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康熙四十七年（1708）刻本，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 溫達等纂，《親征平定朔漠方略（滿文本）》，康熙朝內府精寫本，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 慶桂等纂，《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滿文本）》，嘉慶十二年（1807）大紅綾本，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 穆彰阿等纂，《大清一統志》，道光二十二年（1842）武英殿本，北京：北京圖書館藏。
- Howorth, Henry H. *History of the Mongols from the 9<sup>th</sup> to the 19<sup>th</sup> Century*.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876-1888.
- Kashgari, Muhammad S. "The History of the Khojas of Eastern Turkistan." Translated by Robert B. Shaw, *the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66.1 (1897): 1-67.
- Валиханов, Ч. Ч. О состоянии Алтышаара или шести восточных городов Китайской провинции Нан лу (малой бухарии) в 1858-1859гг.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6, стр. 112-226, 354-362.
- . Киргизское Родословие.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6, стр. 251-293.
- Веселовский, Н. И. Посольство к зюнгарскому Хунтайджи Цэван Рабтану капитана от артиллерии Ивана Унковского и путевой журнал его на 1722-1724. *Записки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Т. 10. В. 2. С.* Петербург, 1887.
- Левшин, А. И. *Описание киргиз казачьих или киргиз-кайсацких, орд и степей*. Алматы: Санат, 1996.
- Ромодин, В. А.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киргизов и Киргизии. В.1.*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73.
- Слесарчук, Г. И. *Русско-мого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685-1691: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кая Фирма,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РАН, 2000.

張建

## 二·近人論著

巴托爾德 (Василий В. Бартольд) 著，趙儷生譯

2013 《七河史》，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

巴德利 (John F. Baddeley) 著，吳持哲、吳有剛譯

1981 《俄國·蒙古·中國》，北京：商務印書館。

札奇斯欽

1978 《蒙古與西藏歷史關係之研究》，臺北：正中書局。

白新良

2006 《清史考辨》，北京：人民出版社。

白翠琴

1991 《瓦剌史》，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

吳元豐

2001 〈柯爾克孜族東遷黑龍江地區考實〉，《黑龍江民族叢刊》  
2001.1：69-74。

伯希和 (Paul Pelliot) 著，耿昇譯

1994 《卡爾梅克史評注》，北京：中華書局。

周清澍

2001 《元蒙史札》，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

茲拉特金 (Илья Я. Златкин) 著，馬曼麗譯

1980 《準噶爾汗國史 (1635-1758)》，北京：商務印書館。

姚念慈

2009 〈再評「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面諭》、歷代帝王廟與  
玄燁的道學心訣〉，《清史論叢》2009：108-186。

馬大正、成崇德

2006 《衛拉特蒙古史綱》，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

桑席葉夫 (Гарма Д. Санжеев) 著，陳偉等譯

1959 《蒙古語比較語法》，北京：民族出版社。

烏雲畢力格

2009 《十七世紀蒙古史論考》，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2010 〈17世紀衛拉特各部游牧地研究〉，《西域研究》2010.2：35-51。

烏雲畢力格、成崇德、張永江

2002 《蒙古民族通史》，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烏雲畢爾紮拉

- 2013 〈清朝邊疆政策——以唐努烏梁海納入清朝版圖及特楞古特、塔本、科勒薩哈勒、柯爾克孜等移住黑龍江為中心〉，烏雲畢力格主編，《滿文檔案與清代邊疆民族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 261-283。

格魯塞 (René Grousset) 著，藍琪譯，項英傑校

- 1998 《草原帝國》，北京：商務印書館。

莊吉發

- 1983 《清代準噶爾史料初編》，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張建

- 2012 〈康熙五十九年烏蘭呼濟爾之戰淺探〉，《清史論叢》2012：74-84。
- 2013 〈和通泊之役與大清國的邊務危機——以軍機處滿文檔案為中心的考察〉，《紀念王鍾翰先生百年誕辰學術文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頁 445-467。

馮承鈞、陸峻嶺

- 1982 《西域地名》，北京：中華書局。

傅斯年

- 2003 〈史學方法導論〉，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頁 307-351。

齊木德道爾吉

- 1993 〈昭莫多之戰以後的噶爾丹〉，《蒙古史研究》4：104-117。

劉正寅

- 1994 〈策妄阿拉布坦對天山南路的征服與統治〉，《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4.2：38-45。

蔡美彪

- 2009 《中國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魏良弢

- 1994 《葉爾羌汗國史綱》，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

韓百詩 (Louis Hambis) 著，耿昇譯

- 2011 〈謙河考〉，鄭炳林主編，《法國西域史學精粹》，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頁 481-504。

韓儒林

- 1985 《韓儒林文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張建

寶音特古斯

- 2009 〈十八世紀初期衛拉特、西藏、清朝關係研究——以「六世達賴喇嘛事件」為中心〉，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蒙古學研究中心博士論文。

羽田明

- 1982 《中央アジア史研究》，京都：臨川書店。

佐口透

- 1966 《ロシアとアジア草原》，東京：吉川弘文館。

和田清著，潘世憲譯

- 1984 《明代蒙古史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

若松寛

- 1964 〈ツェワン・アラブタンの登場〉，《史林》48.6：50-80；漢譯本參見吳永明譯，〈策妄阿喇布坦的崛起〉，馬大正等編譯，《清代蒙古的歷史與宗教》，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4，頁 77-110。

- 1968 〈ジュンガル汗位繼承の一經緯——ツェワン・ドルジ・ナムジャルからダワチまで〉，《田村博士頌壽東洋史論叢》，京都：田村博士退官記念事業會，頁 646-666。

柳澤明

- 1992 〈ガルダソのハルハ侵攻（一六八八）後のハルハ諸侯とロシア〉，《清朝と東アジア：神田信夫先生古稀記念論集》，東京：山川出版社，頁 179-196。

宮脇淳子

- 1995 《最後の遊牧帝國：ジュンガル部の興亡》，東京：講談社。

Adel, Chahryar, and Irfan Habib

- 2003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Turin: Ages Arti Grafiche.

Hodgson, Marshall G. S.

- 1974 *The Venture of Islam: conscience and history in a world civilization*. Vol. 3, *The gunpowder empires and modern tim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erdue, Peter C. (濮德培)

- 2004 “The Qing Empire in Eurasian Time and Space: Lessons from the Galdan Campaigns.” In *The Qing Formation in World-Historical Time*, edited by Lynn A. Struve. New Yor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 57-91.

Бартольд, В. В.

1963 Киргизы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Сочинения. Т.2. Ч.1.*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стр. 471-543.

1968a История Турецко Монгольских Народов. *Сочинения. Т.5.*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стр. 193-229.

1968b Калмыки. *Сочинения. Т.5.*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стр. 538-540.

Владимирцовъ, Б. Я.

1911 Турецкие элементывъ Монгольскомъ языкъ. *Записки восточнаго отдѣлен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аго Русскаго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аго Общества Т. 20. В. 2-3.* С. Петербург, стр. 153-184.

Иванов, П. П.

1958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Москва: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Лебина, М. Г., and Потапова Л. П.

1956 *Народы сибиря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Сорокин, Ю. С.

1965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Лексике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X VIII века.*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Уманский, А. П.

1980 *Телеуты и русские в XVII — XVIII вв.*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Наука.

張建

## Power Reconstruction: New Exploration on the Rise of Hongtaiji Tsewang Rabtan in Dzungaria

Jian Zhang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During the last ten years of the 17<sup>th</sup> century,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Inner Asia shifted dramatically. After Galdan made the Dzungaria Khanate into the overlord of central Asia, he led his troops eastward, hoping to realize again the former glory of the Great Mongolian Empire, but ended up suffering complete defeat and died during this conquest. Kangxi the Great took this opportunity to annex Khalka and Kuku-nor Khoshotes (庫庫諾爾和碩特) into the Qing Empire and became the ruler of Mongolia. Dzungaria was the only place that remained independent, and its leader Tsewang Rabtan was eager to built up strength in order to fight another day.

Tsewang Rabtan was the leader of the Dzungaria Khanate from the end of the 17<sup>th</sup> century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18<sup>th</sup> century. He lost his father at a tender age, and spent most his youth wandering around. He was blind in one eye because of one hunting accident and suffered from syphilis because of his lustfulness, but nonetheless he was also an outstanding politician. In 1689, to escape from Galdan's pursuit, Tsewang Rabtan fled to the Bortala valley (博羅塔拉), where he gained support from Anu Khatun and formed an alliance against Galdan. He also lived for several years in Turman (吐魯番) after 1689. After securing victory in the battle of Kobdo, Tsewang Rabtan forced Galdan out of his base area, fleeing northward to the Kemchik River region. Upon Galdan's death, Tsewang Rabtan gathered the Inner Asian tribesmen, while forcing the forest tribes to move westward to Sirabel (沙喇伯勒) and the Burut tribes to move to Ili, so to ensure a check and balance among the different tribes was in place. With Tsewang Rabtan's painstaking efforts, the Dzungaria Khanate rose from the ruins and again grew into the leading central Asian power that resisted the Qing dynasty for forty years. The rise of Tsewang Rabtan not only changed the fate of the Dzungaria Khanate, but also produced some far-reaching influenc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and Asian history.

**Keywords: Tsewang Rabtan, Inner Asia, the Qing dynasty, Dzungaria Khanate**